



#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东风西渐：铃木大拙与禅  
日本禅学为何能走向世界  
“香”的文化史  
波佩的面纱蒙住了镜子  
蓝色蟾蜍  
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民主的牙齿  
胡适反对计划经济  
盖茨比的了不起





#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夏佑至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 轮值编辑

夏佑至

##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克（德国·图宾根）
灵子（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3年05月 第7卷第4期

总第65期

##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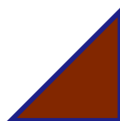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 编者按

本期好几篇文章与宪法和宪政有关。

编者特别推荐吴强介绍德国宪法保卫局的文章《民主的牙齿》。宪法保卫局成立于1950年，是西德建立的旨在保卫宪法权利和自由的情报机构。它的成立，既是为了防止纳粹利用魏玛宪法的漏洞而上台的历史重演，也是为了在情报领域与“冷战”对手相抗衡。作为历史和现实双重焦虑的产物，这一机构在德国政治体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但很少为中国人所知。欧洲的民主实践有悠久历史，也有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在认识权力——特别是秘密权力——的性质及其运作方面，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

吴强用“民主的牙齿”来形容宪法保卫局代表的欧洲“积极民主”和“军事民主”思想。就个人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是文中对宪法保卫局权力蜕化的描述。关于积极民主，我们经历不多，关于权力蜕化，却有丰富的历史可供联想。情报机构为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资助甚至直接推动极端组织实施恐怖活动；通过做大敌人，宪法保卫局扩张和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却远离了成立它的初衷——吴强的文章让人想起电影《伯恩的任务》（又译《谍影重重》）。“民主的牙齿”反过来吞噬民主，宪法的保卫者完成了宪法之敌未能完成的使命，这种制度悖反现象，不能不让人思绪万千。



# 目录

## 封面用图

War or The Ride of Discord  
Henri Rousseau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社会 • 夏佑至

005-012

书评  
专题

• 成庆  
东风西渐：铃木大拙与禅

• 刘柠  
日本禅学为何能走向世界

013-019

书评

• 戴新伟  
“香”的文化史

• 凌越  
波佩的面纱蒙住了镜子

• 夏佑至  
蓝色蟾蜍

020-030

写作

• 王晓渔  
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 吴强  
民主的牙齿

• 林建刚  
胡适反对计划经济

031-048

影像

• 罗四鸽  
盖茨比的了不起

049-051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给大一学生上介绍佛教的通识课，让他们描写一下对于佛教的印象与观感，在一百五十份作业中，几乎所有学生都曾参观过寺庙，但却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佛像和菩萨像的具体区别，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佛教就是烧香拜佛、祈福还愿。他们对于佛教的理解，基本来自于《西游记》，而且还只是电视剧。可以说，这本明代的神话小说，主宰了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佛教想象。

从民间小说来了解中国古代宗教，不仅成为了一般老百姓的唯一渠道，甚至在经过近代各种“反传统”运动之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佛教的印象，往往也来自于古代文学作品。白化文先生写过不少深入浅出的小书，其中有一本《三生石上旧精魂——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北京出版社，2012年），非常有趣，里面谈了不少古代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宗教形象。如谈到《西游记》中那位孙悟空的老师须菩提祖师。须菩提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因为善说“性空义”，被称为“解空第一”，让“悟空”给“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当弟子，但又让佛教比丘示现出道人形象，是为迎合当时三教合流的社会心理，抑或，还有吴承恩的其他用意？

要给学生讲解佛教义理，当然要从“四圣谛”开始说起，可是要讲“苦集灭道”的“苦谛”，其实就让我颇费思量。在今天的



教育氛围里，无论是批判性思维教育，或是各种“心灵鸡汤”式的正能量教育，基本上都试图让学生对未来怀抱一些希望，当年轻人面对各种成长危机，教育者的心理干涉大多仍是正面的激励与引导。我当然能理解这种教育方法，要让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解决方案，我们总是试图迅速远离各种危机和苦难，尽管我们都深知，有的苦难其实根本难以立刻消除。

令人惊讶的是，当讲完佛教所理解的“八苦”后，很多学生在作业中非常诚实且不可抑制地描述了生命中各种关于“苦”的经历，从他人轻蔑的眼神到家中的各种无常变故，

这些年轻人所感知的“苦”，远比自认稍多阅历的老师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与深刻。

是啊，人生充满太多的“苦”，但是作为教育者，似乎总习惯让学生们回避人生的真实面貌，无论是推崇“知识”的价值，还是褒扬“审美”的意义，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在回避人生之“苦”的问题。色达五明佛学院的索达吉堪布去年出了一本新书——《苦才是人生》（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其实就是从“苦”讲起，然后再从佛教的角度介绍“灭苦之道”。你可以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是“苦”的体验难道不是每个人每天所面对的生命真相吗？

当然，要给不同背景的大学生们介绍佛教，入门读物相当难以选择。在准备参考教材时，起先预备了三本不同类型的著作，分别是圣严法师的《佛学入门》、白化文的《汉化佛教与佛寺》以及Damien Keown的《佛学概论》（译林出版社，2011年）。稍对佛教义理有所认知的，自然可从圣严法师的著作单刀直入，如只对佛教文化有兴趣者，白化文先生的书更能解求知之渴，至于那些已经被西方哲学思维熏习的年轻人，恐怕只能借西人的《佛学概论》入门了。但有趣的是，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都能迅速地借助前两种教材迅速切入佛教的基本义理，这也让我我不禁思考，今日常认为的所谓“西化”浪潮，到底只在什么层面，为何这些从未接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年轻孩子，能够如此迅速地与东方思想合拍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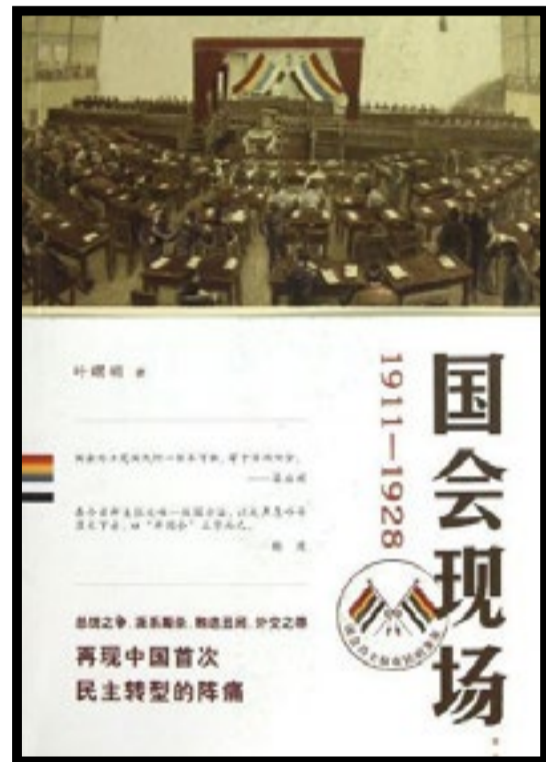
介绍佛教方面的通俗著作，在今天相当苦难。大多数的佛教著作都显得十分专业，非有相当的背景不易阅读，如近来出版的一本相当有趣的佛教美术史著作——邹清泉的《虎头金粟影——维摩诘变相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虎头金粟影”一句取自王维诗“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是王维用以赞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所绘维摩诘像之句，王维本人更是因心慕维摩诘居士而自号为摩诘，足可窥得维摩诘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虽然我想极力推荐这本研究，但也深知，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要直接跳进繁复浩瀚的佛教美术史著作中，其实还是相当不易的。或许，对于佛教的理解，还需要更多的入门通俗读物才能弥补这样的阅读鸿沟吧。📖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l978@sina.com）

5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率先吹响批评宪政的集结号，《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名闻天下。这位法学教授明确否定“社会主义宪政”，认为“这会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宪政的枷锁”，同时呼吁“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随后，《环球时报》等媒体跟进，承认宪法但否定宪政。一位署名“郑志学”的作者发表《认清“宪政”的本质》（《党建》2013年6月），指出“‘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这些文章以罕见的勇气说出了两个“常识”：一，当下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二，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无法兼容。

何谓宪政？《认清“宪政”的本质》做出精确归纳：“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是宪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这段描述基本准确，但有两点需要纠正：一，在宪政体制下，多党不是“轮流”执政，不是排座座分果果，是“竞选”执政，如果赢得选票可以连任；二，自由、民主、法



治、人权是普世价值，不是专属“西方”的价值观。

宪政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晚清以降，立宪法、开国会成为众望所归，虽然很多执政者以国情和民智为由不断向后拖延，但是很少有勇气公开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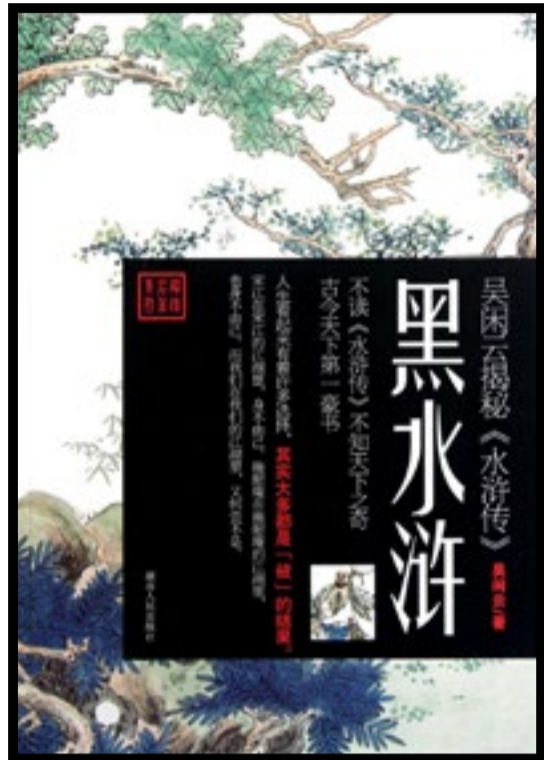
叶曙明先生的《国会现场：1911-1928》（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回顾了中国第一共和时期的代议历史，这是此前经常被忽略或者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在细节上，这本书有可以商榷之处，张耀杰先生在《高度文学化的虚构演绎伪现场》（《新京报》5月18日）里有严厉批评。比如1913年10月6日袁

世凯当选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叶曙明沿袭旧说，表示袁世凯派便衣军警包围国会现场，逼迫议员在第三次投票中选他当总统。张耀杰引用《大公报》报道，指出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袁世凯在第三次投票中顺利当选，已经是毫无悬念，从总票数逐渐减少来看，国会议员是可以离开投票现场的。

宪政之难，“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国会现场》的这句话值得三思。以民智未开为由推迟宪政，不足为训，不必期待一群“雷锋”开创宪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德性又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精英之间动辄以“暗杀”相见，宪政是不可能建立的；如果“暗杀”之后不接受法治的方式，而代之以“革命”的道路，宪政就会被专政取代。

一本重在北方中央政府，一本重在南方“革命”政府；一本重在10年代，一本重在20年代——叶曙明的两部著作《国会现场：1911-1928》和《中国1927：谁主沉浮》（花城出版社，2010年），呈现了从民国到党国的过程。

范福潮先生的《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主要聚焦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尤其是南北议和时期，是对民国的正本清源。书中讲述的孙中山筹款过程，革命后革命党如何继续革命、互相杀戮，在南北议和中南方如何违反议和规则，《临时约法》如何因人而设，这些都是谈论民初宪政之前必需了解的一些常识。不从史实出发，得



出的结论只能是南辕北辙。国民党对北洋政府的批评，比如用权力干涉议员，与列强暗通款曲出让国家利益，国民党（同盟会）自身同样患有这种症状，而且时间更早、程度更深。但是国民党成功地通过革命话语把自己正当化，把对方污名化。

吴闲云先生的《黑水浒》（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一本有趣的闲书。虽然我对《水浒传》的情节颇为熟捻，但是读到吴闲云的奇谈怪论，常常先感到意外，接着被他说服。书中讲到梁中书选中杨志押送生辰纲，是有意为之，希望杨志把生辰纲弄丢，因为所谓“生辰纲”只是徒有其名的石头，杨志的角色是替罪羊，梁中书通过丢失生辰纲成功“洗钱”，把资产转移到自己手里。这种解



读深谙官场秘密，而且作者列出了很多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有一些推论稍显仓促，比如认定林冲杀了晁盖，“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但是书中强调的晁盖系和宋江系的冲突，却不是空穴来风。

20年前，杨健先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几乎是研究文革文学的必读书目，现在终于再版，不知是否为了避讳“文化大革命”一词，题目改为《1966-1976的地下文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报告文学体显得有失严谨，但是鉴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本书依然有着它的价值。只是书中提到的一些作品，比如毕汝协的《九级浪》，至今难以寻觅，未免有些遗憾。📖



观察员 夏佑至（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弯曲的脊梁》（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是对纳粹德国与东德的宣传手法所做的比较研究。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材料来源丰富，但过于偏重文献。而仅仅是文献研究，不足以解释政治宣传何以能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那种魔力。

作者兰德尔·彼特沃克是传播学者。政治宣传是传播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传播学有时候用相对中立的术语如“劝服”，有时候用更具批判性的说法如“洗脑”，来形容国家、政党、商业公司和煽动家向大众灌输特定信息的做法。纳粹德国和苏联开启了把宣传置于政治事务核心的先河。纳粹和苏共都认识到，必须消灭信息传播的多元状态；把媒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们也认识到，要动员群众，就必须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象征体系。这两个国家的宣传模式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从仪式到语言，从组织群众集会到控制媒体，从制造敌人到树立偶像，手法非常类似。宣传机构借用宗教的话语形态，嵌入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动员了数量惊人的党员和政府公务员，负责对国内和国外民众进行宣传鼓动。

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致力于塑造整全性的社会解决方案，或者说一个终极的政治梦想。但在在纳粹和苏共（及其东德版本“统一社会党”）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



宣传的真实作用是劝人们服从。或者说，推销这样一种观念：现实虽然不合理，但再忍耐忍耐，德国梦和苏联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和其他包治百病的终极梦想一样，极权政治宣传都有梦醒时分，其方式不外乎纳粹德国式的“哄”地一响，或苏联式的“嘘”地一声。但在对这类主题进行的研究中，文献法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其限制。受众的反馈是政治宣传的核心，但《弯曲的脊梁》很少涉及受众的反应，因为可靠的文献通常很少。宣传官员不会向上司汇报说，工作毫无成效，自己只是宣传对象心目中的笑柄。文献能够复述一出宣传喜剧的情节，但无法还原观众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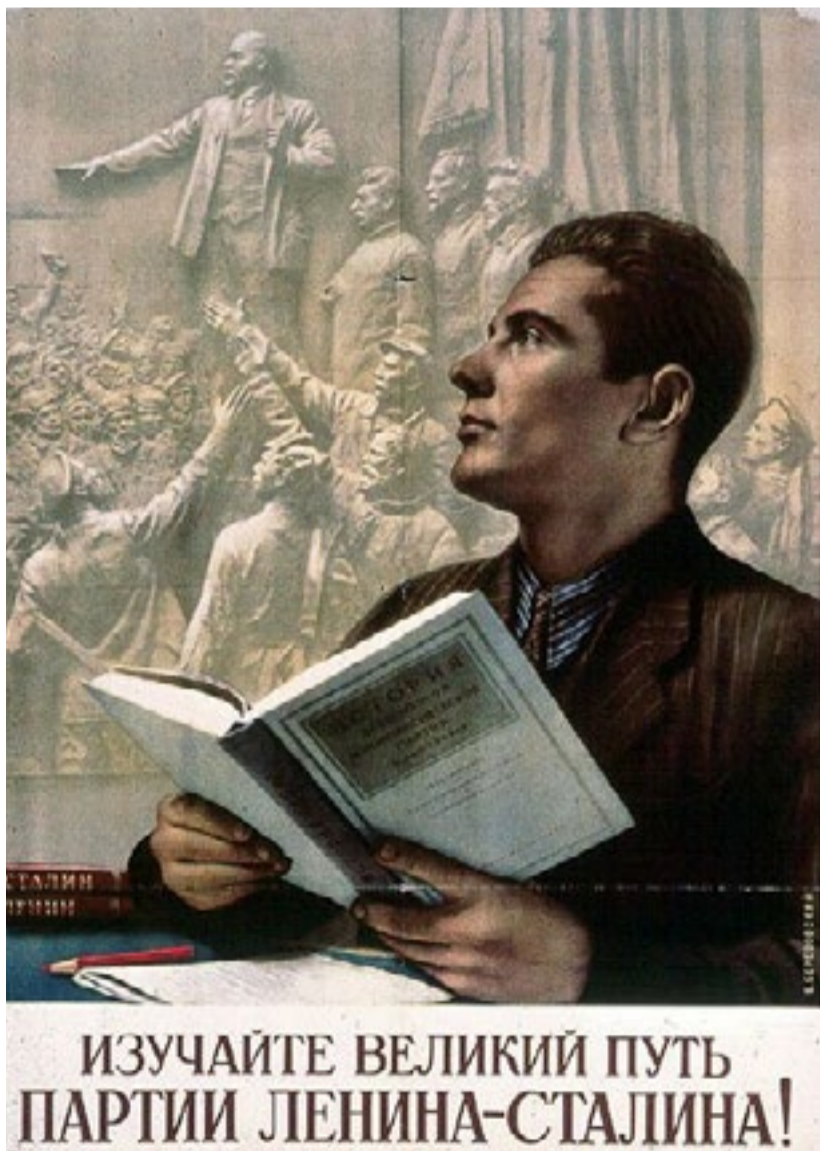


黑暗的台下发出的笑声，更无法探知这些笑声到底包含何种寓意。换句话说，群众是洗脑的对象，但洗脑能否成功，却不像洗衣服那样可以观测。如果作者本人对此亦缺乏切身感受，就无法有深度地描述纳粹德国和东德的民众对政治宣传的实际感受。

缺乏个人体验的研究者容易被文献误导。无论是消灭传播的多元状态，还是创造一个单一的象征体系，都涉及到社会控制。

“宣传”这种字眼给人一种非暴力的错觉，或者至多是一种针对精神活动的软暴力，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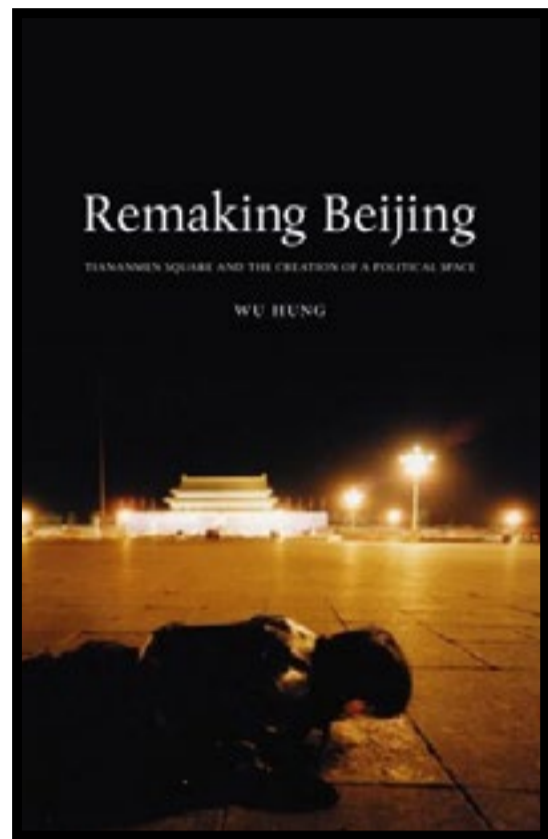
从实际历史看，宣传和直接的、针对肉体的暴力是分不开的。一个研究者，当他在谈论希特勒演讲的感染力时，应该对盖世太保制造的恐怖气氛有同样的感受力；同样，分析一张苏联风格的宣传海报时，人们会被千篇一律但仍不乏感染力的英雄人物的侧面像所吸引：他们微微抬起下巴，与肩膀形成一个45度的夹角，体态和表情都传递了信仰和乐观。必须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档案中的照片对照阅读，才能对这类海报的美学取向有一个清楚的判断。而对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不前的苏联生活有所体验的人，会抱着更加讽刺的心情看待宣传画的技巧——高大的海



报人物形象所象征政治价值，已经变成了冷笑话。而这类笑话的可笑之处，往往在转化成文字或翻译成其他语言时消失殆尽。

个人体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最好的情况下，文献与个人经验应该互相补充，但现实中却往往彼此歪曲。学者可能因为囿于个人体验而失去应有的超脱，也可能因为缺乏体验而陷入皮相之谈。少数作者试图在同一个文本中容纳两个维度，如巫鸿的Remaking Beij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这本书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天安门的历史文本所作的分析，另一部分是巫鸿自己的生活史。两部分内容如同两条河流，不断交汇又不断分离。这种实验性写法有得有失。总的来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个人体验通常只能作为深层背景存在，且需要受方法论的检验和限制。

对这个话题，人类学者曾有过一场大争论。1967年，倡导“参与式观察”的马林诺夫斯基去世25年后，后人发表了他在Trobriand Islands做田野调查时期的日记。他曾据日记中的材料写出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但其中关于他本人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以及他与土著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内容，之前从来没有披露过。正是这部分内容，引发了对民族志知识可靠性的怀疑。在大谈研究者主体性的后现代语境下，实证主义一直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有此争论并不奇怪。这场争论的余绪在两本人类



学回忆录中都有体现。奈杰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和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追寻事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有着不同的文体和叙事方向。巴利对田野调查方法大加奚落，倒是反倒是主张“解释人类学”格尔茨，不愿根本否定社会科学方法和知识的“客观性”，引人深思。

也许，写作上的主客观两难，只有通过对话式的阅读才能缓解。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2013年)可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 1996年)对读。我曾力荐出版社的朋友买下前书中文版权，但久无回音，本以为碍于审查无法出版，如今中文版顺利面世，颇感惊喜。Q

# 东风西渐：铃木大拙与禅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1928年8月11日，中国近代最有名望的僧人之一——太虚法师，从上海乘船，开始其长达九个月的欧洲行程。在这次访问行程中，太虚法师接受法兰西学院的Sylvain Levi教授的邀请，在东方博物院举行了一场演讲，在这场堪称“失败”的讲演中，太虚法师试图表达科学与佛教的亲缘性，但这种论调对于现场聆听的西方人而言，却没有激发起他们对佛教的丝毫兴趣。

细细想来，要在20世纪初面对西方人讲述东方文化的魅力与价值，逆近百年“西风东渐”之流而上，太虚法师这一代人，潜意识中或多或少难有真正的自信。就在太虚法师访欧之行的三十年前，在美国芝加哥曾召开过一场“世界宗教大会”，当时代表日本佛教界的临济僧人宗演禅师在演讲中如此说道，“佛教是普世性的宗教，它同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与哲学是完全相应的。”相隔三十年，宗演禅师的论述与太虚法师近乎一致，或许都显现出，作为东方文化代言人

的佛教徒在当时所面临的种种窘境与不得已。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演讲中担任宗演禅师翻译的，正是后来以“禅学”广弘于西方的铃木大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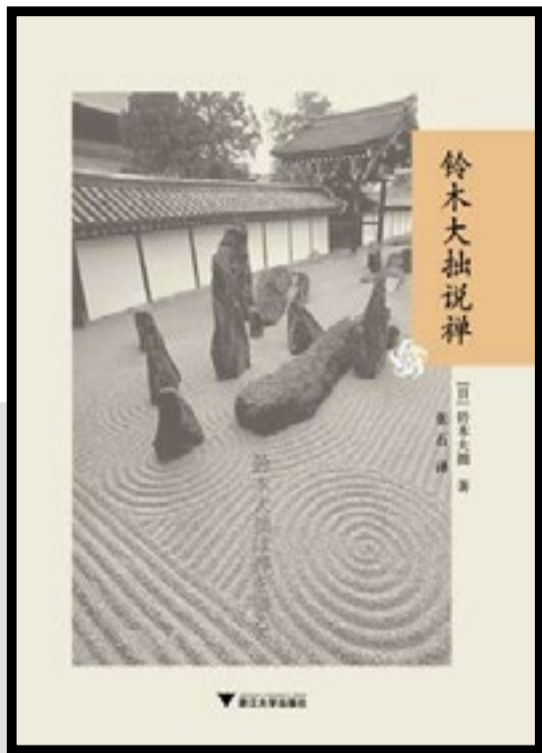
从法脉传承来看，铃木大拙师承明治一代名僧今北洪川与释宗演，属日本临济宗圆觉寺派，其源头可回溯至宋元之际来日弘法的汉僧无学祖元，以弘临济禅为宗。不过铃木大拙在欧美世界以弘“禅”闻名，非以出家人身份，而是以居士学者之身，相比其师宗演禅师或太虚法师而言，铃木最为成功者，乃是他成功将禅宗精神转换为西方人所习惯的话语，进而能让他们能够理解乃至修持深奥玄妙之“禅”。

让东方的灵性思想摆脱本土文化的束缚，使其核心教导直接赤裸裸地展现于西洋世界，可谓是20世纪以降数位灵性大师所致力的方向。在铃木之前，已有印度灵性大师克里希那穆提在欧美世界广作铺垫，而在其后，日本禅师铃木俊隆、西藏上师丘阳

创巴仁波切乃至那位争议颇大的奥修，都是这一“东风西渐”谱系中的重要代表。以佛教为例，如何融入西方的文化，而不让自己所属的文化背景限制佛教的弘化，是日本禅宗、藏传佛教当时初入西方所普遍面临的问题。铃木大拙长期维持居士身份，而丘阳创巴仁波切则更是主动选择还俗，或多或少都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化隔膜有关。

但读者或许要问的，铃木大拙带给西方世界的“禅”，到底是什么？一种文化？一种哲学？抑或是某我们也并不熟悉的内容？民国时期，胡适曾与铃木大拙有一场非常激烈的禅学史争论，胡适对铃木大拙的主要批评，就是认为他所论述的“禅”，乃是一种非理性化、非知识化的神秘经验，与现代西方知识发展方向完全背离。但悖谬的是，铃木大拙在西方暴得大名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他使用了西方人所能理解的哲学、宗教话语来解释“禅”。只不过，铃木大拙无论在表达形式上如何西化，甚至以英文直接写作，他对“禅”的阐述都完全建立在佛教本位基础上，只是他利用佛教的观念直接回应了西方世界中那股怀疑、批判乃至反抗主流价值的精神吁求，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心理学家，如弗洛姆、荣格都对铃木大拙的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因为心理学对于西方理性主义思维传统而言，长期以来其实都扮演着消解、挑衅和怀疑的角色。那位被誉为“疯智”上师的丘阳创巴仁波切，则更是吸引了一大帮耽溺于毒品、酒精的美国嬉皮士，例如大名鼎鼎的金斯堡。

不过，铃木大拙假如真正想将“禅”的精神从日本文化中梳理出来，实际上是一



项相当复杂且繁琐的工作。在这本《铃木大拙说禅》（张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中，铃木大拙处理了几个核心问题，即禅的核心观念是什么、佛教与基督教之间到底有何差异，以及禅宗和日本文化之间到底是何关系？事实上，虽说铃木大拙当时所面对读者的是西方人，但随着西风东渐的深入，令人尴尬的是，这几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东方人而言，其实同样是暧昧不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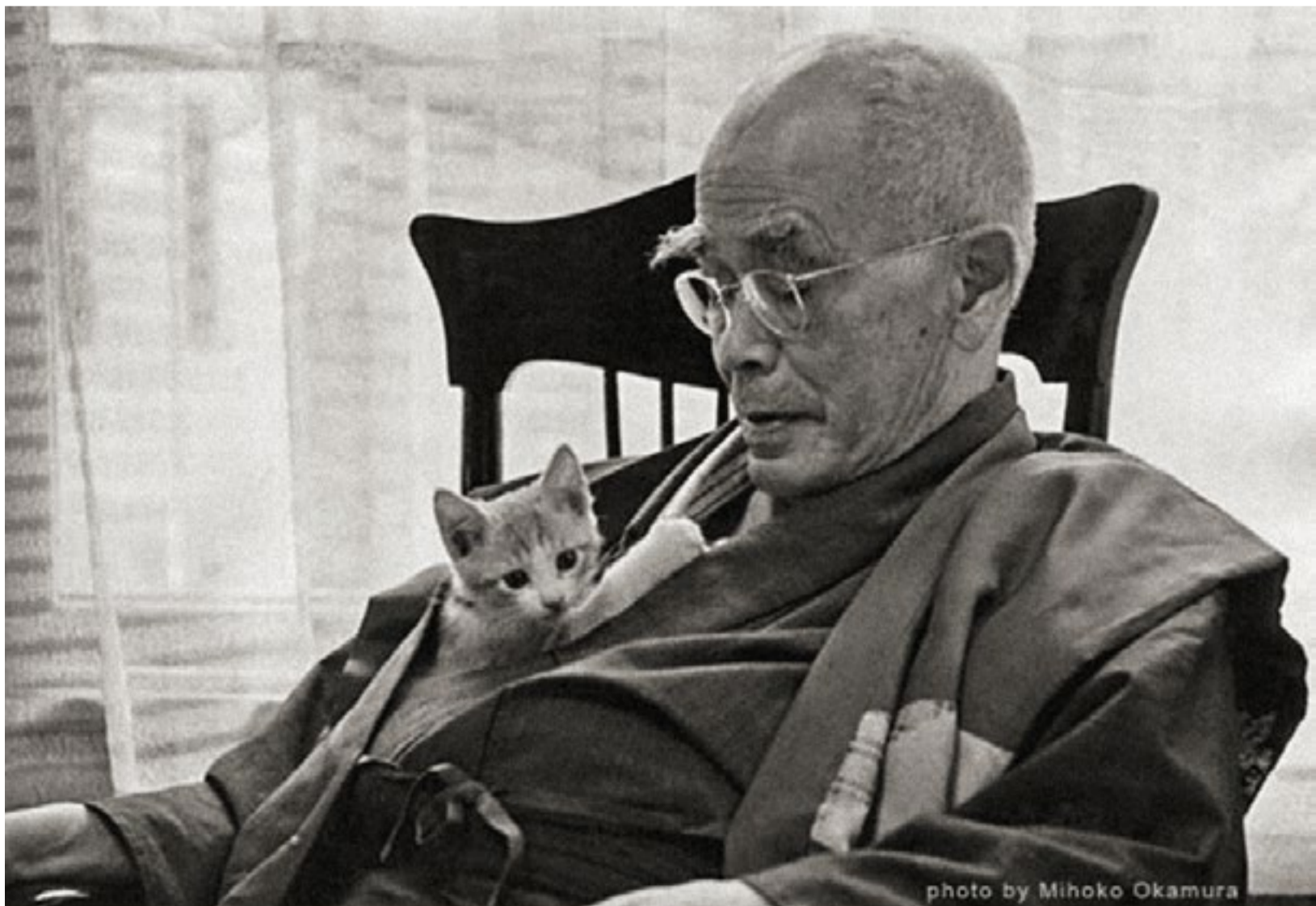
以“禅”为例，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它已经被严重地滥用与“心灵鸡汤化”，沦为“品茗抚琴”式的闲情雅致。这种似是而非的误解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甚至比一无所知的西方人更有害处。因为一旦“禅”演变为一种附着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那么我们所继承的只不过是一些浅表的仪式传统，反而对其精神越发得陌生。因此当铃木大拙说出，“禅试图超越逻辑，发现一个不包

含对立的高层次的肯定”，东方人通常会认为，禅就是混沌一片，就如一个大箩筐，随自己感觉来任意添加内容。今天“禅”在东方世界的庸俗化与肤浅化，实际上就与“禅”已成为东方内在文化内容有重要的关联。

但是，要对一无所知的西方人介绍“禅”，同样举步维艰。尽管铃木大拙依靠种种“否定法”来破除西方人的牵强比附，“禅”既非哲学、也非宗教、是无神论，自然就非一神论，更不是泛神论。这种种否定均表现出，“禅”的内涵乃是一种完全迥异于西方思维的框架体系，铃木大拙就好像禅宗史上各位祖师一样，当没办法直接呈现出“禅”的真实意涵时，他们都选择了最常见的手段——“破斥”。于是，铃木大拙不断论述禅（佛教）与基督教的差异，禅的思维方

式与哲学的不同等等，当然，偶有一些正面立论——“佛教的优越之处，正在于它抓住了变化即永远，永远即变化这一点。”但是，要真正理解“变化即永远，永远即变化”，何其难也！

铃木大拙的思想真正影响美国人，应以1927年所出版的《禅佛教论集》为开端，从此铃木受到广泛称誉，其著作甚至被誉为“新福音书”。这一波“禅”的风潮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暂告一段落，美日之间突然成为熟悉的“陌生”人，随着战事日深，日军种种“超常规行为”使得美国人大为震惊，不知如何理解日本人的各种极端行为。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受美国政府委托，著名人类学家本迪克斯曾写了一本畅销著作——《菊与刀》，分析日本的深层民族心理。此书一出，



晚年的铃木大拙。摄影：Mihoko Okamura

photo by Mihoko Okamura

顿时洛阳纸贵，似乎依靠此两个迥异的符号就可以理解日本深层的文化心理，如崇美却黷武、好礼又好战之特征。

但依铃木大拙之分析，日本文化中种种看似矛盾之处，其实是与“禅”的本土化有莫大的关系。在禅宗进入东洋前，天台宗、真言宗已基本确立了日本佛教的大致格局，而当禅宗在镰仓时期进入日本后，因其教法、趣味与公卿贵族的取向不符，故遭到后者的反感和排斥，禅僧纷纷避走京都，最后在镰仓北条家的庇护下逐渐兴盛。因此，日本禅宗一开始就是受到武士阶层的青睐才得以落地生根，而这种结合既与禅宗那种豪放不羁、寄情山水自然的特质有关，也与武士道自我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强烈需求有关。从此，武士阶层一方面构造起“和、敬、清、寂”的茶道文化，另一方面，也利用禅在生死问题上的简易与直接而构造起影响后续上千年的武士道精神。

举例而言，宣扬武士道的《叶隐》一书中即有此语：

武士若不离生死则一事无成。所谓万能一心者，听来似有心之事，实则离生死之事。武士之功皆源于此。

将武士道的精神提升到禅宗修持的“有心”与“无心”层面，本是因为武士一族时刻处于“生与死”之边缘状态，不得不真实面对生死问题，但一旦将用于参悟生死的禅融入武士道，成为一种“调心之法”，则“道”与“魔”之分别，则越发难辨其真义。尽管在汉传禅宗史中，有各种“激进”的禅法教授公案，但此等违背世间道德俗情的方法于禅门中人而言，也需对机酌情而用，一旦泛滥，则其本来面目难免会模糊难辨。二战之中，坐禅被引入军营之中用以培养武士道之精神，或多或少都在提醒我们注意“禅”与“武士道”之间那根若隐若现的红线。

《禅与日本文化》一书出版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西田几多为铃木大拙写了一篇短序，西田是哲学家，早年铃木大拙弘扬“禅学”时，西田曾批评铃木大拙理论不足，但西田的“绝对无”哲学，却深受铃木大拙思想的影响，在以西田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中，公认是战后最为巅峰的一部著作就是西谷启治的《什么是宗教》，这或多或少可窥出，铃木大拙的“禅”与20世纪日本思想界另一条隐秘线索之间的关联。

禅是什么？铃木大拙当年所面对的西方人的这一番发问，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反思时代精神的一个新的起点。Q



# 日本禅学何以能走向世界

BOOK VIEW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2012年的初冬，头一次访问北陆地方历史文化名城金泽，目的之一，是参观铃木大拙纪念馆。午后两点，到了本多町。又按图索骥，找到了三丁目。但见一座丘陵的山脚下，有片低矮的建筑群，清一色银灰色钢混结构，风格很现代，背倚满目苍翠的山坡，十分打眼，这就是铃木大拙纪念馆。建筑的周围，是一泓池水，即著名的漂浮在“水镜之庭”上的“思索空间”了。视线越过“水镜之庭”，是古树参天的山麓。时值11月底，银杏叶尚未落尽，枫叶如丹，浓绿的背景中点缀着金黄和枫红，整个一幅印象主义水彩画。可遗憾的是，因连日冬雨，导致山路苔藓茂生，恐游客发生意外，从前一天起，闭馆三日。惜乎笔者此行在金泽只能逗留一日，只好在纪念馆周围试着“觉悟”一下“禅境”，便与大拙匆匆别过了。

此地正是铃木大拙的生诞之地。1870年11月11日，铃木大拙(D. T. Suzuki)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本多町的一个医生家庭，原名

铃木贞太郎，大拙为其居士号。这位被思想家梅原猛称为“现代日本最大的佛教者”的哲学家，学贯东西，一生致力于禅学研究及日本禅文化的海外推介，同时用日文和英文写作，著述等身，约百种著作中的23种为英文著作。这本《铃木大拙说禅》，集大拙禅学之精粹，在西方学界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今天通行于西方的“Zen”，正是源自大拙对日文“禅”的译译。1940年，该书中部分内容的日文版由岩波书店出版。至2004年，已再版71次，说家喻户晓并不为过。

大拙说禅，并不是谈禅宗史，而是谈禅的性格——禅是什么、不是什么，禅的方法、路径——禅如何看世界、如何思考，以及禅的目的和意义。常言道“知易行难”，可就禅而言，知本身就不易。因为说到底，禅是一种洞彻的智慧，能真正做到“知”，便相当程度上接近了禅的本质。而禅的本质，在于抵达和把握世界的存在，即所谓“真实在”：“禅给予我们看透世界的眼睛。禅的

金泽铃木大拙纪念馆中的『水镜之庭』

摄影：刘柠

范围遍及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而且要超越它。”为此，大拙从学术上廓清了几个世纪以来氤氲于“禅”的概念之上的重重云霾，极大缩短了我们与之“链接”的距离，譬如谈禅宗与东西方宗教的异同、与审美的关系，等等。

禅宗最初舶来中国时，是作为佛教的附着物。公元6世纪，从南印度到中国来的菩提达摩被认为是禅的始祖，而达摩无非是佛教的一派，其教义也与大乘佛教的一般教义无甚区别。但在中国传布过程中，融入了许多程式和基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要素，用大拙的话说：“禅是中国的实际精神和充满高远思索的印度形而上学的牢固焊接。”中国禅宗从唐到宋，有很大的发展，至明已呈强弩之末。镰仓时代，中国禅宗再渡扶桑。室町时代，在幕府的庇护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生机勃勃的日本禅宗。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向世界，成为西方现代思潮中的一股涓涓细流，对现代艺术的影响虽不是暴雨滂沱式的，但润物无声，始终不绝。

客观地说，禅宗之有今天走向世界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进入日本后的发展。日本宗教学者铃木范久认为：“禅佛教思想，特别是其‘一如’的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不断地面临生死危机的武家社会中，‘生死一如’、‘剑禅一如’的思想受到欢迎。在这一思想的传承过程中，最终产生了‘绝对矛盾的自己统一’的西田几多郎之哲学。”<sup>注01</sup>

传入日本的禅有三支：一是临济禅，因

坐禅时伴之以公案<sup>注02</sup>，又称“公案禅”，由荣西和尚于1191年传入。荣西曾在中国学习南宗禅，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并从宋土带回了坐禅时的饮品——茶。他带回的茶种，分别引种于三个地方，其中一处是京都附近的宇治，至今仍是日本出产上品茶的产地。另一支是曹洞禅，由禅僧道元于1227年传入。道元以越前（今福井县）永平寺为修行之地，以“只管打坐”（Shikantaza）为要诀，一心修行，故亦称“默照禅”。道元主张通过坐禅回归释迦，提倡“见性”（Kenshou），赋予坐禅以日常生活的实践性（所谓“风性常住，无处不在”），成为镰仓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而为后世禅宗的发展开辟了革命性的道路。第三支为中国福建书僧隐元和尚于1654年传入的黄檗宗，传入最晚，但比其他宗派更富于中国禅学的“原汁原味”。

大拙写道：“当人们问一个禅匠：‘禅是什么？’他当即回答：‘平常心。’何等的简明而又切中要害！禅与所有的宗派品质没有交涉。……禅是大海，禅是大气，禅是山岳，禅是雷鸣、闪电，是春天开放的花朵，夏日的炎热，冬天的雪。不，禅是这以上的东西，禅就是人。禅不拘于在长久的历史中积淀的形式上的行为、因袭和其他的附加物，它在中心事实中生机勃勃的生存着。”至此，大拙已然道尽了禅的性格——禅“无处不在”，是一种“人间精神”，且超越任何形式之上，“随心所欲”；禅修的目的，“是使灵眼洞开，洞察存在之理由本身”。

<sup>注01</sup>见《宗教与日本社会》（铃木范久著，牛建科译，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45页。

<sup>注02</sup>在禅宗中，为参禅者准备的、使其在坐禅时领悟的一些课题，多是以古德言行为内容的难问，如“狗子佛性”、“只手之声”等。

舶来的禅宗之所以能在日本发扬光大，除了上述武家社会中武士们的信仰诉求外，另一个重要的生长动力无疑是艺术。或者说，禅与日本艺术，尤其是中世以降的文化艺术构成了某种“共生”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于这一层，大拙著作中有相当详尽的展开，诸如禅与茶道、美术、建筑、剑道、俳句的关系，等等。尤其是茶道，对日本艺术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和全方位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传世名著《茶之书》写道：“我们所有的茶道大师都是禅的弟子，并且力图把禅宗的精神渗透到实际生活中。因此，茶室像茶道仪式中所有的设施一样，表现了许多禅的教义”；<sup>注03</sup>“我们的许多纺织品是以设计他们的色泽和图案的茶人的名字而命名的。确实，难以找到一个艺术领域而没有留下茶人天才印迹的。在绘画和漆器领域列举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显得多余。”<sup>注04</sup>日本最辉煌的画派之一琳派<sup>注05</sup>就是由茶人本阿弥光悦开创的。现代设计大师田中一光说：“我尽量跟琳派保持距离，只敢从远处眺望，因为我怕有被琳派的这种伟大的生命力吞没的危险。”<sup>注06</sup>在传统东洋美术和建筑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对称性，甚至视不对称性为最高的美。佛教寺院的建筑设计，便大胆贯彻了这种美的法则：“虽然山门、法堂、佛殿等主要建筑物是建在一条直线上，但次要的、从属的，有时甚至是很重要的建筑物，不是作为主线



的两翼排列的，后者往往是适应地势的特征，不规则地分散建成。”可以说，正是这种艺术语言，赋予了日本禅学以不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乃至明治维新后，开始溢出国界，向世界辐射，其影响力至今不衰。Q

<sup>注03</sup>见《茶之书·“粹”的构造》（冈仓天心、九鬼周造著，江川澜、杨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42页。

<sup>注04</sup>见《茶之书·“粹”的构造》（冈仓天心、九鬼周造著，江川澜、杨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80页。

<sup>注05</sup>亦称光琳派，桃山时代后期（日本17-18世纪）的装饰画派，以茶人本阿弥光悦为思想奠基者，尾形光琳为集大成者。画派汲取大和绘的某些技法，以大胆的空间处理体现江户风的装饰性，对后世绘画和工艺美术有深远的影响。

<sup>注06</sup>见《设计的觉醒》（田中一光著，朱锴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62页。

# 香的文化史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 [peessoal935@gmail.com](mailto:peessoal935@gmail.com))

“‘香’弥漫于文学，历史，也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宗明义，和正式的学术文章不同，奚密这本《香：文学 历史 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虽然跨了三种范围，其实清浅。“你知道曹操最爱九层塔，曹丕最爱迷迭香吗？”这诚然能立刻吸引读者的好奇心，表明趣味所在，更关键的是，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趣味的彰显。

一种事物的起源、字义、流播、相关的著名人物及其轶事，以及在我们当下生活中的形态，有的人聚焦于一处，截取一个部分即可成文，考其名目含义，足以成为一部著作。这是常见的文化史写法。而更常见的是《香》——它是全面的涉及。虽然这也是文化史的一种写法，但读来并不让人心折。

芳香文化，芳香疗法，芳香学，在西方是专门的课程，奚密此书即是从西方文化入手，探讨香在其文化中的作用。然后，旁征博引，观察香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本书谈到的三十余种花，果木之香，首先就是寻找

文献上关于它们的记载。比如曹丕将迷迭香自西域移植中土，并写了一篇《迷迭香赋》来赞美它，“附玉体以行止兮，顺微风而舒光”，而欧洲文明则视迷迭香为隽永回忆的象征，葬礼、婚礼都有它的身影。而女性将它放在外出的丈夫的旅行箱里，意味着防止外遇。

引用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诗歌），不仅有经典作品，还有现代诗人如杨牧、纪弦、夏宇等人的作品，甚至还有龙榆生写的现代诗《玫瑰三层》。不过，最为耳熟能详的材料，莫过于由西蒙与加芬克尔二重唱（Simon and Garfunkel）演唱的英国民谣《斯卡布罗市集》，歌里说，市集上香草商人云集，带来香菜、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在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中，香菜代表了喜庆，鼠尾草代表贤惠和健康，迷迭香象征忠贞和回忆，百里香象征勇气。而这首美妙深情的歌谣却有着严酷的背景。中世纪的瘟疫年代，香草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人

人佩戴香草，还堆积起来焚烧，借以净化空气。虽然在当时于事无补，但由此产生的各种芳香疗法和手艺，却流传至今。

我记得香港导演严浩拍的电影《厨房》里，就有一段是借吃饭讲述碗里的几种香料，并且轻声唱起了这首歌。这也是一点文化史的材料，正如将来我们回顾这十年，板蓝根同样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

玫瑰之与里尔克，丁香之与戴望舒，莲之与周敦颐，菊之与陶渊明，都是香与文学紧密结合且深入人心的例子。奚密又从西方的角度，扩展了我们阅读的视野：香水中，以玫瑰、茉莉和桔花三种天然精油最为昂贵，只有最高级的香水才包含这些成分。


“香奈儿5号”就兼含玫瑰和茉莉，而且只用法国南方格拉斯的精油。而丁香当今年产量逾八万吨，百分之七十都来自印尼，在十五六世纪，欧洲与印尼的香料群岛发生了丁香争夺史。而在中国东汉以后，臣子觐见皇帝时口含丁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可以类似今天的口香糖了。屈大均的一条记载也可作为佐证，《广东新语》中说，（丁香）“从洋舶来者珍。番奴口尝含嚼以代槟榔。”

读奚密此书，连带又翻出《广东新语》、《岭外代答》、《中国伊朗编》、《香料传奇》等书对读。书中关于桂花的一节《“吾”三桂》，对桂花的介绍似有失简单，且说“桂花又名木樨，因为它的木纹像犀牛角”（p135）。据《岭外代答校注》，桂属樟科，果实长椭圆形，而木樨是木犀科，俗称桂花，并不结果。而且明确指出，桂花与肉桂皆称“桂”，实不同类，二者同名乃在唐代



以后，“凡经传言桂，皆非今之木犀，唐以后始名木犀为桂花。”现在桂花的品种更多，作为博物文章，似乎更应该准确。而拿桂作文化史的文章，比如，在四川，近年收树种的行业发达，竟有一种说法，桂花中的月月桂（又称四季桂），因为“月”近“药”的发音，卖不上价；而在广东，众所周知，“桂”谐音“贵”，所以极受青睐。在茉莉一文中，关于其名字来源，一是来自波斯语，译作耶悉茗、耶塞漫、耶惠茗，与英文同一字源（yasmin），另一来自梵文（mora），译作末利、末丽、抹丽，“加上草字头后就成了现在通用的‘茉莉’”（p66）。茉莉的原产地是波斯，引进之后在广东地区广为种植，因其喜欢阳光。不过，我关注的是，从末利、末丽、抹丽到茉莉，这个草字头是怎么加上去的？是因为这个地区根深蒂固的讨口彩习

俗, 还是其他原因?

“文化的定义一度非常狭隘, 但现在又已经变得过分宽泛。”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探讨新史学中“社会文化史”和“文化社会史”不同的位置时这样说。他还有一个观点, 也足以帮助我们看待一些文化史方面的著作, 他把比较“自然”现象的历史保留“文化”, 把属于文化产品的研究保留“社会”。以本书为例, 关于西方社会中芳香文化和洗浴文化的交流有一段, 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喜欢沐浴, 其中也有精油按摩。但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基督教曾禁止人们上澡堂, 因之在十九世纪前的欧洲人很少洗澡, 于是香水发达起来。我觉得这段足以说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紧密不可分, 更说明要从后者入手, 去研究、发现前者。文化史的有趣也正在于此。抛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 文化史便失去了丰富生动的可言说性。同样的, 也可以在当今流行的文化史著作中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做这项研究的人, 究竟是在罗列(我们不知道的名字与材料), 还是在为我们证明这个名字与这个材料的关系? 

# 波佩的面纱蒙住了镜子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镜中的忧郁》（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 郭宏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是一本小书，如果剔除译者“漫长”和不得要领的序言——里面有大段大段生吞活剥般的引用——和书末所附的斯塔罗宾斯基两篇著名的文章《波佩的面纱》、《批评的关系》，这本“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不过是几万字的小册子而已。相对于《恶之花》雄心勃勃的抱负，这几万字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纤细了，斯塔罗宾斯基在前言里也坦承：“这些文本是不完全的，是部分的。……未曾对波德莱尔的忧郁之表现的全局提供一个分析。”但是他也不忘为自己辩护：“危险在于迷失道路于大量的材料中。因此，必须划出一条道路，放弃附属的小路。”

对于本书，这条道路就是考察忧郁和反映之间建立起来的微妙又诗意的联系。因为这个明确的主题，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塔罗宾斯基选择讨论的波德莱尔诗作，通

常并不是被后世批评家广泛赞誉的作。，斯塔罗宾斯基之所以选择这七首诗——《告读者》、《一本书的题词》、《忧郁之四》、《献给圣勃夫》、《声音》、《远行》、《喷泉》——是因为所有这些诗作都和斯塔罗宾斯基关注的核心姿态——低垂的头，朝着镜子的观看，忧郁的沉思——有关。

从这个路径，我们立刻意识到斯塔罗宾斯基日内瓦学派的学术出身。这个学派为20世纪批评家们持续不断地为自身累积自信和自尊奠定了基石。斯塔罗宾斯基和另外几个日内瓦学派的主将乔治·布莱、马塞尔·雷蒙等虽然在批评实践中存在分歧，但是他们显然都认为批评乃是一种主体间的行动，批评主要的不是建立于审美判断的基础上（那样太简单？），而批评家也不再是作家们的附庸，他们和作家具有平等的关系，批评家应该“力图亲自再次地体现和思考别人已经体验过的经验和思考过的观念”。批评作为一种“次生文学”是与“原生文学”

平等的，也是一种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也就理解了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划出一条道路”是何含义了。斯塔罗宾斯基挑中那七首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的意象和思想暗合了他一贯关注的那些问题——忧郁、沉思以及凝视。

书后所附的两篇文论，多半是出版社为了把书加厚到中国读者习惯的厚度，以便于定一个可以赚钱的价码，但是通读全书，你会发现《波佩的面纱》一文确实和正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读完了《波佩的面纱》，你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镜中的忧郁》。前者是斯塔罗宾斯基批评观念纲领性文本，无疑写得更为出色。在文中斯塔罗宾斯基以淫荡著称的古罗马美女波佩总是蒙着面纱为隐喻，探讨了遮掩和不在场之间所酝酿的奇特力量，并且将批评家的批评活动纤毫毕露地呈现出来。

悖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斯塔罗宾斯基终于将批评上升到诗的高度，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可以发现批评的敏感和诗的敏感其实是一回事。在《波佩的面纱》中，精彩的论述层出不穷，相形之下，《镜中的忧郁》则要逊色不少，尽管后者是以前者的例证的面目出现的。个中原因，也许是波德莱尔强大的诗篇终于覆盖了斯塔罗宾斯基绞尽脑汁的思辨，波德莱尔诗作的自在、直接的魅力，使斯塔罗宾斯基努力的思辨变得沉闷，偶然的闪光也在黑夜之幕布的衬托下渐趋沉寂。

如果我们对照斯塔罗宾斯基在《波佩的面纱》中充满自信和神采的论述，我们不免要唏嘘不已：“完整的批评也许既不是那种以整体性味目标的批评（例如俯瞰的注



视行为)，也不是那种以内在性为目标的批评（例如认同的直觉所为），而是一种时而要求俯瞰时而要求内在的注视，此种注视事先就知道，真理既不在前一种企图中，也不在后一种企图中，而在两者之间不疲倦的运动之中。”毫无疑问，这甚至算得上是真知灼见，但是运动中的真理确实太难掌控了，当他试图在《镜中的忧郁》中追逐这变幻莫测的真理时，他遇到的问题没有丝毫减少，并因此而显出疲态。

《波佩的面纱》是1961年出版的文论集《活的眼》中的一篇，比《镜中的忧郁》要早二十多年，但两者之间依然有清晰的承继脉络。在《波佩的面纱》里，斯塔罗宾斯基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对于凝视的“凝视”：“凝视具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力量，它不满足于已经给予它的东西，它等待着运动中的形式的静



止，朝着休息中的面容的最轻微的颤动冲上去，它要求贴近面具后面的面孔。”虽然斯塔罗宾斯基承认“看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但是他也意识到“凝视保证了我们的意识在我们身体所占据的地方之外有一条出路”。对于凝视的深入思考衍生出许多有意思的观念，而批评活动显然也被囊括其中，甚至在很多地方以“凝视”的名义，被予以抽丝剥茧般地梳理，以还原出批评最本质的面目。二十年过去了，斯塔罗宾斯基依然在“凝视”，只是在他视线的前方加了一面镜子，而所有的思考都因为这面镜子的存在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镜子的反射本身就充满自省的意味，而且激情亦在这一过程遭到抑制而变身为反讽，甚至复杂到斯塔罗宾斯基不得不以波德莱尔的诗句作为中介予以阐明。

看起来，没有比波德莱尔的诗句更合适的批评中介了。波德莱尔的诗句情感充沛而且复杂，正好对应着斯塔罗宾斯基在思之漩涡里的挣扎——如果不能说是沉沦的话。他选取的波德莱尔诗句并不巧合地都含有“镜子”的意象，比如在一首献给圣勃夫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在这面镜子的面前，我完善了/初生魔鬼教给我的残酷艺术。”在《喷泉》一诗里则是：“你们的忧郁多纯洁，/是我的爱情的明镜。”在《自惩者》中：“我是镜子，阴森可怖，/悍妇从中看见自己。”在《无可救药》中：“阴郁诚挚的观照中，/心变成自己的明镜！”在《被冒犯的月神》中：“没落世纪之子，我看见你母亲，/对镜俯下多年的重重一堆，/给喂过你的乳房艺术地擦粉！”在《情人之死》中：“他把门微微打开，进来擦拭/无光的镜子




和点燃死灭的火。”镜子的确是波德莱尔诗歌的重要意象之一，这绝非偶然，因为镜子的意象暗示着波德莱尔诗作隐藏着的多重悖论和反转，这既是波德莱尔诗作复杂之处也是其魅力之源。同样不是偶然的是，斯塔罗宾斯基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早在《波佩的面纱》里他早就说过“看是一种危险的行为”，而镜中的注视自然是凝视的一种，并且这注视是指向自身的，因此尤其具有一种感伤和讽刺兼备的意味：“一系列的反映蒙上了阴影，天使般的人的命运结束于浑浊的水的深处。”

应该说，斯塔罗宾斯基从镜子这一意象进入波德莱尔的诗歌，是抓住了阿喀琉斯之踵，并且和自己一贯对于批评的精深思考找到了对接的豁口。别忘了，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都有一个和批评对象竞争的潜在愿望，那么将角力的战场转移到自己熟悉的领域自然是聪明之举。不过，也许斯塔罗宾斯基并没有那么复杂，也许他会耸耸肩不以为然地反问一句：“所有的批评家不都是在说自己的话吗？”但是这一回，在转换波德莱尔的诗句为自己的批评声音的过程中，斯塔罗宾斯基遇到了麻烦，尽管他极尽批评思维之所长，将观念的复杂性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所引用的波德莱尔的诗句总是以一种明晰直接的力量，将他自己的分析逼入墙角，尽显生涩黏稠的面目——当然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段。波德莱尔的诗句是明晰的又是深刻和复杂的，这未免将旁观者的立场转移到诗人的阵营中，看来日内瓦学派诸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他们想要和卓越的诗人分庭抗礼的话。

话说回来，在《波佩的面纱》里，斯塔罗宾斯基对于批评家实际上的不利位置其实早有远见，悖论的是，正是这些观点反过来说明斯塔罗宾斯基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批评家，并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和诗人对话的资格。这段话很精彩：“追寻的是最远，导致的却是最近的，即第一眼就看到的显然之物，形式和节奏，这些东西乍看好像只是许诺了一种隐秘的信息。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语词本身，意义居住其中，神秘的珍宝亦在其中闪光，而人们原以为应该在‘深层’寻找这珍宝。”我们也可以方便地利用这段话去理解波德莱尔的诗和斯塔罗宾斯基的分析之间的差异，或者说高下。波德莱尔以诗人的极度敏感，在热情洋溢的诗句内部即完成了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往返，他以点石成金般的语言魔术将前往等同于返回，而斯塔罗宾斯基的努力终究是单向的（尽管他意识到抽身回顾的重要性），在向意义的深层奋力掘进时，他反而和“神秘的珍宝”渐行渐远。

波德莱尔对于镜子意象的痴迷，终于以一种肃穆的注视改变了忧郁，反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诗人隐藏自身羞于示人的痛苦的绝佳障眼法，反讽在现代性的照耀下几乎所向披靡，因疯狂的噬咬的嘴脸而具有一副禽兽的面貌。作为批评家，斯塔罗宾斯基对于镜子关注的原因和诗人们稍有差异，他早就以注视所蕴含的多重意义来阐述批评的特点，除此之外，他当然也会觉得对于批评家来说，所评对象（诗人、小说家）也是一面反射着批评家形象的镜子，而且因为其中裹挟着所评作品的颜色和气

息，这束幽暗的反射之光变得格外朦胧，如同波佩的面纱轻柔又邪恶地披拂在脆弱的镜面上。镜子的效果是专横而虚无的，它接受又探询，将所有的疑问毫不犹豫地回掷给我们。作品终将会摆脱掉纠缠在自己身上的注视之网，显出它自身热情的面貌，而批评家也会主动将自己抛出去的鱼饵收回，批评家将赢得他自己，正是在此意义上，斯塔罗宾斯基的名言会再次被确认：

“注视，为了你被注视。” 

# 蓝色蟾蜍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意外抓到一只特大蟾蜍。他把蟾蜍放进一只铁桶，泡上稀释过的蓝墨水，期待蟾蜍的皮肤变蓝，并为此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计划。这个计划，简言之，是以蓝色的特大蟾蜍为班底，组织一个足以轰动全城怪异事物展览，然后通过卖门票发家致富。他特意带我到他的宿舍，关上门，从床底下拖出水桶，展示他的收藏，试图说服我成为他的合伙人。与其说我被这个计划的商业前景打动了，还不如说，眼前的一切带给我一种超越现实的梦幻般的感觉。我们蹲在铁桶旁边，耐心地等待蟾蜍变蓝，直到双腿酸麻，而蟾蜍一动不动为止。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最近突然想起来，每个细节都还很真实。这个同学的样子也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顺带还想起其他和他有关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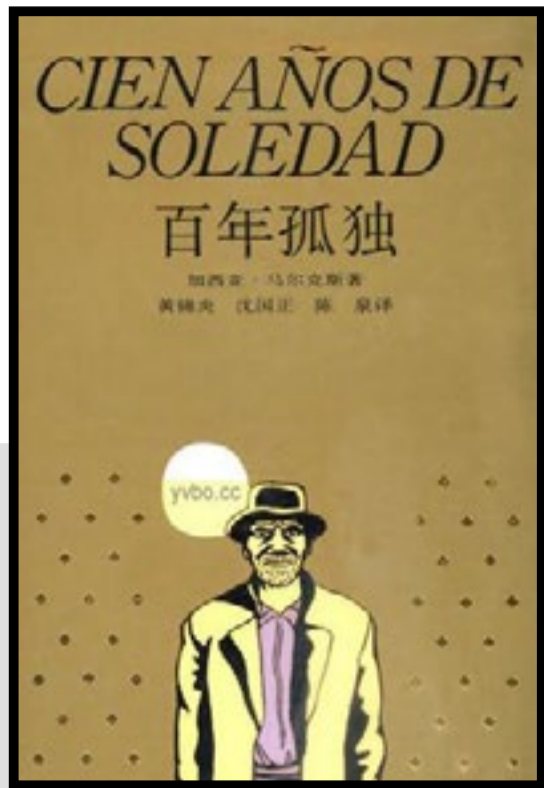
蓝色蟾蜍的巡演计划失败之后，他参加学校运动会的长跑比赛，从此变身为长

跑健将。那时候，房产开发还没有在小县城里兴起，两车道柏油路面的105国道从本县中部穿过，行道树后就是农田，县城四周的景观还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遗迹，包括一条为群众体育运动规划的长跑路线。这条路线共计4.8公里，很长一段路在城外，沿途没有路灯。现在想来，在这种道路上跑步，一定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那里空气新鲜，视野无碍。我偶尔跑过一段，随着吸进肺部的空气越来越少，双腿变得很僵硬，渐渐地，大脑就失去了对下肢的控制。一边机械地迈动脚步，一边擦变得模糊的眼睛，我觉得，如果一直跑下去，也许可以跑进时间隧道里去。我读过一些科幻小说，非常希望能够进入其他空间，摆脱可悲的升学压力。但往往只有一瞬间，我就回到了现实。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过这种感受，甚至必定有人进入了时间隧道——以我的同学为例，就算他的肉体回到这这个世界，心却永远留在别的什么空间里。

他像专业运动员一样规划自己的时间，长跑计划风雨无阻（下雨的时候，就带上一把大黑伞）。如果跑步中途变天，他并不改变预定的步幅和节奏。很多人见过他从途中跑变为冲刺的情景。他长大嘴巴，不但是在吸气，也是在无声地呐喊，奋力向着看不见的终点冲去。在大脑的某个部位里，他也许享受过观众的欢呼，然后载誉而归，拿着塑料桶和毛巾走进了水房。1996年的冬天很冷，每到晚上，水房里传来他冲凉时惊天动地的叫喊声。我们躺在又冷又湿的床铺上，听着如此尖锐骇人的叫声，觉察出每一声叫喊，都夹杂着自我折磨的痛苦和超凡脱俗的欢乐，不禁身体微微哆嗦。在他的叫声中，我的心绪变得苍白虚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乏味的一天就此黯然结束。

我们私下认为，这位同学一定会被汽车撞死在路上，但他幸存下来，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哲学（企业管理方向），后来进了一家自来水厂上班。我常常想，他学的复合型专业和自来水厂这种地方，怎么能安放一颗如此疯狂的心呢？

他的所作所为给周围的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时间长了，让人分不清何为虚幻，何为现实。等我看到《百年孤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10月），立刻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投缘。比如，马尔克斯写道，奥雷良诺第二的情妇佩特拉·科特有旺盛的生命力，她待过的地方，动物都发疯地繁殖。有一天“兔子的响声吵得他们整夜无法安睡。天亮时，奥雷良诺第二打开房门一看，院子的地上铺了一层兔子，晨光熹微中一片青蓝色。”这个情节和我经历的事情有一种



惊人的相似。

我从来没有见过蓝色的兔子，也从来没有见过蓝色的蟾蜍，但这世上确实有人相信它们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生命的教育，目的是让我们相信，疯狂乃是人性的一部分，疯狂深植于我们的头脑和心灵之中。

我念书的时候，105国道两旁载着两排杨树，修长的枝干上面虫眼累累，潮湿的洞口上挂着木屑，疤节和瘿瘤让它们显得脆弱不堪，似乎一阵风就会把它们统统吹折。我很喜欢这种景象，于是一边踩着叮当乱响的自行车，一边在脑子里完善几种短时间改变世界的大计划。这种思考非常消耗热量，让我在上坡的时候感到特别吃力。

很多年过去之后，杨树仍然伫立在路

边，但道路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道改线，柏油路缺乏维护，形成大大小小的坑洼。如果在雨后路过这些洼地，正好一辆卡车疾驰而过，行人全身都会被溅满污水。肇事车辆消失了，那个人还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从头发到鞋子都滴着水和泥浆，心里气得要命，却毫无办法。柏油路面后来换成了混凝土，沿途盖起了许多碉堡状的二层楼房，墙上涂满了电信公司、化肥厂和摩托车广告。亲切动人的乡村景色，渐渐消失在了无处不在的红色塑料袋里。这些塑料袋堆积在路边、树下、河里，挂在灌木丛中，在风中飞舞。世界的确改变了，但与我的设想很不相同。

话说回来，不管我怎么努力，那些改变世界的疯狂计划，如今我一个都想不起来了。

几乎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经历一些奇人怪事。这使我确信，世界并非总是看上去那么整齐划一。为了保持内心平衡，依照正常人类的标准生活下去，这些人和事通常必须被忘记——也许是假装忘记，因为他们常常袭扰我的梦境。有时候，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觉得生活如同从最后一排座位上望出车窗，大路两旁的景色迅速后退，而路边依稀可见细长的歧路。我力图忘记的人们站在歧路上，面容永远年轻，永远是我刚刚遇到他们时的样子。他们目送我在常人和凡人之路路上越去越远。醒来后，我感到惋惜和伤感，不是为他们，而是为我自己。❶

# 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l978@sina.com）

19世纪下半叶，陆续有零星的清国士人注意到“立宪”，但最初仅限于那些不走寻常路的士人，比如在科举上浅藏辄止的王韬和郑观应。他们在通商口岸和传教士、商人打交道，不再把“番邦”视为茹毛饮血之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王韬就曾远赴“番邦”英国，注意到“君民共治”的制度。

经过三波冲击，“立宪”终于被广泛接受。

第一波发生在第一代清国驻外使节身上。这些使节最初曾把“番邦”视为化外之国，等到远涉重洋身临其境，与王韬一样，发现“番邦”更接近中国士人推举的“三代”。为什么会这样？立宪是很重要的原因。清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讲述了日本立宪的过程，强调官民共同受治于法律的重要性。（“朕亲裁之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很久很久以后，使节再到英国，只是看到了经济发展

“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思想道德“失范”，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第二波是在戊戌时期。虽然光绪在宣布咸与维新的《明定国是诏》中未曾提及立宪，但是与“智囊”们讨论过立宪的可能性，最后考虑到国情，决定暂缓。

第三波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这场发生在清国境内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而告终。当时举国上下竟像自己战胜一样，认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从此被广泛接受，不仅是朝廷上下的共识，也在朝野内外达成一致。可以这样说，自此以后，虽然既得利益者常常不愿被关进立宪的笼子，找遍各种理由推脱，但是公开否定立宪者微乎其微。

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进程加快：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留日的曹汝霖曾应邀为慈禧和光绪讲立宪，光绪临

终前阅读的书目中更是不乏立宪类著作。

后来的历史往往放大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认为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但是两者是否有如此之大的区别，非常值得存疑。两者的区别，君主立宪主张保留君主，但君主的权力要被虚置；民主共和主张直接废除君主。虽然在君主存废上存在分歧，但是在立宪上，双方具有共识。

关于晚清新政，存在很大争议。过去认为是假改革，所以产生革命；后来发现改革力度不小，转而批评革命派太激进。但是，这又无法解释为何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如果新政让人满意，温和派为何成了激进派？晚清新政并非一成不变，1908年是重要的分水岭。那一年，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摄政王载沣取而代之，但他并无政治和行政才能，时时“进一步，退两步”，促使立宪派和革命派合二为一。立宪派逐渐放弃“告别革命”的想法，开始接受革命的选项。从观念上说，正是立宪和革命合二为一，导致了辛亥革命。

1912年民主共和之后，再回到君主制几无可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袁世凯、张勋虽有否定民主的勇气，却不敢否

定立宪。他们即使有“帝王梦”，也不会公开声称回到君主专制时代，而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虽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被视为倒退，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成为否定“立宪”的历史罪人。

袁世凯称帝采取了君主立宪的形式，即“洪宪”，在“新皇室规范”里规定亲王、郡王“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支持他的杨度写过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论证“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非君主不足以立宪”固然难以成立，“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却值得三思。即使张勋“复辟”，也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康有为为溥仪拟定的复位上谕，表示“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张勋所推行的所谓君主立宪，能不能做到英国的“虚君”，是可以存疑的，他们可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开否定立宪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后来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把自己定位为训政的保姆，但同样不会公开否定立宪。因为谁都知道，谁公开否定立宪，谁就是在自掘坟墓。Q



# 民主的牙齿



特约撰稿人 吴强（北京，qiangwu.de@gmail.com）

近几年，中国人对民主的认知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学者们如林达和刘瑜等对美式民主的近距离观察和细节感受，“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俨然成为共识，自由女神般的民主想像主导了人们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渴望。相比之下，对欧洲的民主——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民主生活，以阶级合作和协商民主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多数中国人仍然缺乏足够认识。恰在不久前，最新007电影《天幕降落》在中国公映，为观众重现了好莱坞背景下一个似乎与时代脱节的军情六局(MI6)，但这多少有助于国人了解，民主体制原来如此倚重情报和反间机构。在当今民主国家，对间谍与政治极端主义的监控，往往才是现实政治和民主生活中最有先行权的政治实践。

在学术领域，这些与民主安全相关的题目通常被忽视。学者们似乎不了解，民主也是长牙齿的。这不仅适用民主体制对外采取干预主义，例如北约干预巴尔干危机、联军进

攻伊拉克和阿富汗、北约干预利比亚革命、法军干预马里冲突等等；也适用于德国宪法保卫局这样的特殊反间机构。相比CIA、军情六局这些被好莱坞化的谍报机构，德国宪法保卫局为保卫宪法秩序的任务而生，对保卫民主的使命有着更强的焦虑感，几乎就是“积极民主”或者“军事民主”的制度化身。

## 宪法保卫局的起源、组织和冷战

早在二战结束后的过渡期，对纳粹的各种清算逐一进行。除了在纽伦堡战犯审判和各地占领军建立的“去纳粹化法庭”对纳粹成员的甄别作业外，还有一种清除纳粹的行动至今仍未解密，大多只是零星见诸一些纳粹亲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有一个共同场景：半夜，那些前纳粹官员、党卫军(SS)成员的德国宪法保卫局家门被敲开，一队占领军突然闯入。在核对身份无误后，前纳粹党徒

被强行押走，随后就在附近的树林里被立即执行枪决。

占领军的这一极端行动或许源于民主最深处的焦虑：战后法庭对这些身负屠杀和迫害罪行的纳粹官员的审判，仍然是按照纳粹时期的法律来审判、定罪，大批纳粹的罪行因此可能在形式上并不成立，不利于民主转型，于是秘密处决作为德国战后去纳粹化的转型正义形式之一，便有其必要和效果，民主也是应该长牙齿的。

这段占领军戒严时期秘而不宣的“军事民主”，为宪法保卫局所奉行的民主激进主义作出了示范。1949年，当德国宪法（基本法）通过，新生的德国民主在第一时间内，不仅面临着对失败的魏玛民主和纳粹罪行的反思，同时也面临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1950年，宪法保卫局在科隆成立，她的宗旨被宪法法院确定为“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意在避免魏玛宪法的“价值中立”缺陷而无力防止极端主义上台、更甚者毁灭民主。所以，从一开始，宪法保卫局就明确地受“价值约束”，而且在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的领导下，同时防范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势力，守护宪法秩序。当然，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左翼极端组织RAF红军派的活跃，在1972年的宪法保卫法中，这一宪法保卫职能也被悄悄转化为国家保卫——尽管德国社会一直存在争论，认为宪法保卫和国家保卫两者并不必然相关。

由于守护宪法秩序的定位，宪法保卫局有别于CIA之类的反间谍机构，或可归类为政治警察。而德国的政治警察，则可追溯到普鲁士时期。1878年，普鲁士内政部建立

“内部安全局”，集合了警察和情报工作，到1880年代为了执行禁止社民党的任务，进一步强化了政治警察的功能，尤其针对企图颠覆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出版物。不过，这一时期，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权力只限于普鲁士王国地区，而非德意志帝国全境。一战后的魏玛共和，1922年加强政治警察的法案被巴伐利亚抵制，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势力在巴伐利亚形成气候。纳粹上台后，以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颁布的法令为标志，希姆莱建立起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警察体制，包括党卫队及其秘密安全机构——盖世太保。

当然，宪法保卫局从一开始就与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划清界限。在筹建新的联邦政府的同时，联邦议会于1949年建议未来的宪法保卫局不应具有逮捕权，而只有收集情报的权力。这一情报性质的规定，界定了宪法保卫局和警察体制在德国主体体制内的不同功能。宪法保卫局没有警察权，不能采取阻止、讯问、搜查、羁押、逮捕、调查嫌疑人等直接接触手段，不能搜查私人住宅、扣押私人物品，也不能要求警察或其他政府机构协助。这一原则既是宪法保卫局内部纪律，也被写进1972年《宪法保卫法》和统一后的1990年修订案中。换句话说，民主需要牙齿自卫，但是不能咬人。

另一方面，宪法保卫局的组织结构相当分散，这也与盖世太保的集权模式迥然不同。各州的宪法保卫局归各州内政部领导，并不完全与位于科隆的宪法保卫局总部保持一致，相互间也未必一致（比如在对待前东德的统一社会党(SED)的继承者民主社会党(PDS)的问题上，汉堡州和勃兰登堡州的态

度就较为暧昧)。而协调宪法保卫局和各州宪法保卫局的职责,则落在内政部长和总理府部长(办公室主任)身上。也就是说,宪法保卫局的组织架构反映了联邦体制的政治安排,其日常事务也进入联邦的政治日程之中,而不是独立于日常政治之外、如美剧中的CIA阴谋家一般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不过,宪法保卫局并非德国唯一的情报机构。除了警察情报机构——位于波恩的联邦刑事局之外,战后德国共建立了三家情报机构:1950年在英国的帮助下,宪法保卫局最先在科隆建立(科隆属于英军占领区),现有职员近七千;其次是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联邦情报局(BND),1956年在美国CIA的帮助下建立,至今仍与CIA保持着有力的情报交流,主要工作是技侦、反恐和对付有组织犯罪,更接近FBI的角色,雇员六千,过去几年总部逐渐迁往柏林。联邦情报局可能是联邦机构中最晚迁址的,不过,正因她长期驻扎慕尼黑,才有了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尼黑才成为欧洲的情报中心——而不是波恩、科隆或者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所在地)。宪法保卫局和联邦情报局都有自己的专门学校,前者以社会科学的情报分析为主,后者的学校则以技侦和反间谍为主,1970年代后期并入联邦行政管理学院。第三家情报机构则是军方的情报局,负责军队的情报和保密事务。

## 与斯塔西的本质区别

如果跟东德的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局)相比,宪法保卫局的规模要小很多,但效率却一点不低。1988年斯塔西的雇员

为91,000人,另外还有18万秘密线人,相当于每十万人中有超过500名正式特工,而同期西德每十万人中只有6名特工。但最重要的区别是,宪法保卫局的职责在于保护“宪法秩序”,即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特别是个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权力分立、政府责任、行政合法性、司法独立、多党制和每个政党的均等机会,包括宪法框架内的反对权利等。不难看出,这些基于魏玛民主的教训所总结的宪法秩序,具有相当强度的积极民主意涵,更需要一个类似宪法保卫局的机构防范某一个极端主义政党或者组织,在内部实行反民主的纪律,然后利用民主权利破坏民主秩序本身,比如威胁司法独立和行政合法性、以及强迫结社侵犯个人权利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现代政党——社民党,曾经先后经历过铁血宰相俾斯麦和纳粹镇压,战后社民党痛定思痛,也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体系。特别是,政治对手阿登纳的基民盟新政权内保留了相当的纳粹分子,深受诟病。如Friedrich W. Heinz,曾任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勃兰登堡师情报官,1950年起担任阿登纳的情报负责人,甚至第一任宪法保卫局长奥拓·约翰(Dr. Otto John)也是一位前纳粹法官。因此,社民党极为重视对宪法保卫局的控制,其情报体系很大程度上寄生在宪法保卫局内部。波恩和科隆所在的北威州的宪法保卫局尤其重要,在1949年社民党赢得北威州胜选后,这一人事争夺便成为可能。老社民党人弗利兹·特耶希(Fritz Tejessy)被成功

当选为首任局长，他政治记者出身，曾参加过二战期间北欧英军特勤活动。从1950年就任到1964年去世的十几年间，特耶希对当时反对德共(KPD)、直至1956年彻底禁止德共、奠定同时反对极左和极右的政治路线上，起了关键作用。

宪法保卫局内部机构的设置，也反映了这种政治任务。宪法保卫局的一部负责技侦；二部为右翼极端和恐怖主义部；三部为左翼极端和恐怖主义部；四部任务为反间谍；五部专门对付外国的极端主义。在冷战期间，宪法保卫局长期与东德间谍机关做斗争，反间谍部也逐渐成为规模最大的部门。尽管如此，谍战重重，宪法保卫局未能防范东德间谍纪尧姆窃据勃兰特总理秘书职位多年，这也成为宪法保卫局乃至整个北约在冷战期间最大的间谍丑闻。

冷战结束后，四部的重心转向工业间谍。据其情报分析，在德国的外国工业间谍占整个间谍规模的三分之二，保护德国的工业秘密成为宪法保卫局的重要使命。2000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公开确认传说中民间谍报网Echelon存在，并对德国企业发出警报。据称Echelon主要依靠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技术支持，从卫星和海底电缆截取电信和互联网流量，并有英国、新西兰、澳洲等国机构参加，却从未被承认。

## 重视极右 主要防极左

各种极端主义被视作宪法秩序的敌人，宪法保卫局区分极端主义是以“采取非法或

合宪手段以外的行动，反对联邦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存在、安全或外部利益”为标准，并不涉及所有口头或非口头的、非暴力的、使用民主手段对资本主义和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政治制度提出的批评。

最近二十年，宪法保卫局还将他们所针对的极端主义区别于激进主义，只要后者仍然尊重现行宪法，就不构成宪法敌人。这也是宪法保卫局自1960年代末开始对付红军派以来得到的教训。在许多德国同情者看来，即使红军派做出过许多恐怖主义的暗杀和爆炸行动，在理论上仍然属于社运的激进主义，对宪法秩序并无敌意，而只是对“基本现状”不满。相形之下，美国著名的科学教派却在宪法保卫局的“邪教名单”上，不仅传教分支被监控，每当科学教派的明星教徒汤姆·克鲁斯入境拍片，无论是谍战片还是扮演斯道芬博格这样的反纳粹英雄，宪法保卫局都全程紧盯。

如此种种在情报战线上的细微差别，或者说宪法保卫局所执行的特殊的民主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对民主反思的结果。这些看似细微差别，却导致欧洲民主和美式民主的重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也反映在德国的外交态度上，比如伊战爆发时美欧的不同态度、法德在北非革命和马里冲突的干预主义和反干预主义的区别等。从这个角度，那些通常颇为费解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为什么民主制度竟然导致对内对外如此强硬的军事手段，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在采取上述干预行动时的差异？

日常工作中，宪法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监控极左和极右的极端势力。早在1950

年代，在宪法保卫局的努力下，德国宪法法院先后于1952和1956年禁止了社会帝国党(SRP)和德国共产党(KPD)，开启了对极端主义政党进行最严厉惩罚的先例。不过此后，再无针对国内公民的禁止结社制裁，包括2003年试图禁止极右政党——国家民主党(NPD)也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宪法保卫局在NPD内部安插了大量线人，要求解散NPD的禁止令意味着这些线人可能暴露。

这种与极右势力之间牵扯太深、以致投鼠忌器的暧昧关系，使宪法保卫局长期以来饱受批评。公众认为，宪法保卫局不仅未能阻止德国新纳粹的兴起，也未能有效地防止新纳粹的暴力活动。

一方面，宪法保卫局对极右政党长期渗透，活跃的NPD成员中多达100人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200余位NPD头目中大约有30位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而这个政党成员到2003年不过6600余人。宪法保卫局对这个重要极右组织的监控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效果可疑。

到2010年，全德境内约有219个极右组织，2.5万名极右分子，其中9500名为暴力分子，当年共发生了16375件“右翼政治驱动的刑事案件”，其中806件涉及暴力。右翼分子们已不再满足混进球迷队伍、将足球场变为新纳粹的表演场，或者在街头制造年度“战斗之夜”，比如每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柏林、汉堡、德累斯顿等地几乎都会发生极右暴力分子与极左力量的冲突、互殴；而且从1998年起，已经连续制造了10起谋杀、14次银行抢劫和一次炸弹袭击，袭击目标直指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等穆斯林移民。

遍布德国全境的极右暴力活动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宪法保卫局依靠人工情报的渗透方式和效率成为众矢之的。据估计，80-90%的NPD线人未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仅左翼的绿党和左派党对宪法保卫局的低效大加挞伐，社民党和基民盟也非常不满。社民党议会党团领袖奥珀曼(Thomas Oppermann)在2011年11月公开承认宪法保卫局的失败，未能真正掌握极右恐怖主义的结构；禁止NPD也再度成为NPD之外所有左中右政党的共识。2012年宪法保卫局更换新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ßen)上任，但这并没有改变公众对宪法保卫局的不信任。

而另一方面，左翼阵营对宪法保卫局与新纳粹之间的暧昧关系投以更深的怀疑，担心宪法保卫局可能利用新纳粹的暴力发动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迫害行动，德国因此可能被宪法保卫局或新纳粹绑架而变成“第四帝国”。他们揭露，在被称为“新纳粹之州”的图林根州，其州内政部长盖博特(Jörg Geibert)在200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该州三分之一的新纳粹分子都是宪法保卫局的线人、受到宪法保卫局特工的保护。

而宪法保卫局特工的卷入之深及其背后动机，不免让人们产生阴谋论想象：一个新的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 NSU)，被指控应为2001年至2006年期间八起枪杀土耳其和库尔德移民以及一起女警被害的恐怖案件负责，他们还制造了2004年科隆市土耳其街区的一起爆炸案。到2006年4月16日，21岁的土耳其青年Halit Yozgat在卡塞尔被杀，这是第9件类似谋杀。疑凶

Andreas Temme, 宪法保卫局特工, 被发现隐蔽地出现在这位土耳其青年开设的网吧监控录像中, 最后是循着DNA痕迹追踪到此人。在稍后2006年11月4日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 发现涉案枪支与此前九起枪杀外国移民和女警案相同, 且编号属于政府枪支。两位抢劫犯最后承认是NSU成员, 但旋即可疑地“自杀”身亡。检察机关的调查于2007年被迫中止, Temme现在在黑森州一家政府机构工作, 连环枪案的调查也停止了。类似的案例还包括2005年多特蒙德发生一起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枪杀案, 疑犯新纳粹分子Sven K.最后被法庭开释; 极右分子Michael Berger, 2000年6月14日在多特蒙德和瓦尔特诺普(Waltrop)枪杀了两名警察,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又射杀了一名临检的督查警官。后有消息称Berger是宪法保卫局特工, 而他的罪行并未列入恐怖袭击统计。

站在这场批评风暴最前沿的, 是德国左派党极右问题专家、前联邦刑事法院法官沃尔夫冈·内斯科维奇(Wolfgang Nešković)。他多次直言宪法保卫局在监控极右翼极端势力方面的失败是难以置信的, 而相形之下, 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工作倒还可接受。作为左派党人, 内斯科维奇的评价相当中肯, 反映了宪法保卫局“重视极右, 主要防极左”的政治警察态度, 尽管宪法保卫局对左派党高层的监视、甚至对一些自由派媒体的监视, 一直争议极大。公众担心, 宪法保卫局对所谓极左势力的监控是否范围过大、以至干预到正常的公民社会。

## 红军派 宪法保卫局的杰作?

1956年联邦宪法法院禁止德共后, 原德共党员大多仍然在宪法保卫局的监视下。但是, 1967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后, 新的极左力量出现了, 包括“六月二日行动”(Bewegung 2. Juni)和红军派(RAF)。而这些极左力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为警察暴力的滥用, 甚至柏林墙两边的间谍与反间谍机构的阴谋。参照宪法保卫局对极右势力的渗透和操纵, 这种加诸于极左力量上的阴谋论也许并不令人意外。

1967年6月2日, 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西柏林, 沿途遭到柏林市民抗议。示威人群中, 27岁的学生奥纳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射杀在一处停车场。但法庭对这名警察的审判最后以无罪告终。1989年之后解密的东德档案表明, 库拉斯当时已经是斯塔西的一名间谍。如果他的射杀行动是在执行斯塔西的任务、以挑起西德学运冲突, 那么可以说他做到了, 而且效果超乎成功。不久, 同样在右派报纸《图片报》的煽动下, 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学徒工枪击了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 激起学生的愤怒。宪法保卫局似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挑战, 因为激进的学生们很快就转向建立“六月二日行动”和“红军派”这样的学生军事组织, 开展城市游击战, 先后制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暗杀行动。

这些案例包括: 1972年2月2日, 在柏林一家英国游艇俱乐部和盟军驻地制造货车

炸弹袭击；同年3月3日在柏林刑事警察局制造炸弹袭击，1975年2月27日绑架基民盟的柏林市长候选人洛伦兹(Peter Lorenz)。这些活动在1977年秋天达到了高潮，红军派对西德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性人物发起了攻击：1977年4月7日，在卡尔斯鲁厄街头狙杀了西德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和他的司机及保镖；7月30日在德意志银行总裁庞托(Juergen Ponto)于奥伯鲁塞尔的家中将其杀死；9月5日绑架了西德雇主协会主席、奔驰公司总裁施赖尔(Hanns Martin Schleyer)。1977年的秋天也因而被称作德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秋天”。

德国电影《巴德尔和麦因霍夫集团》(2008年)还原了这一段历史，并生动展现了宪法保卫局如何孜孜不倦与这些左翼极端主义斗争的情形。不过，宪法保卫局在其中真正扮演什么角色，非常耐人寻味，几乎为宪法保卫局后来处置极右翼势力提供了先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参与1977年街头狙杀总检察长布巴克的乌尔巴赫(Peter Urbach)，实际上是宪法保卫局的特工。他在红军派的角色是提供行动所需的武器，因此也有一个外号“城铁彼得”(S-Bahn Peter)。只是，红军派的同志们不知道他找到的手枪、冲锋枪、突击步枪、炸药、手雷等五花八门的制式军用武器，都是宪法保卫局提供的。1967年起，乌尔巴赫从就从宪法保卫局接受任务，成功渗透进入红军派，负责武器输送。

如何理解宪法保卫局安插乌尔巴赫并且主动提供武器、间接帮助红军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恐怖行动？虽然事实上，宪

法保卫局也不是唯一的武器提供者，早有克格勃叛逃到西方的军官揭露，克格勃也为红军派提供武器和情报，在背后操纵和利用着西方阵营内部的左翼激进组织。

须知，红军派们代表的德国“68革命”一代，不同于德共的老一辈。他们生长在战后的优裕环境中，父辈们或者战死或者远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典型如红军派第一代领导人巴德尔的家庭，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源自父爱缺失而产生的对父辈的造反；同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并不认同苏联模式或斯大林主义，有意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新左”。只是，对红军派来说，他们是“革命权利”的行动者，站在整个资本主义意识生产的对立面，认定暴力是打破大众对资本主义有限度使用暴力进行统治的幻觉的唯一有效途径，而不是仅仅作为合法斗争的非法之翼(illegal wing)；武装斗争因而是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

对宪法保卫局来说，对左翼极端主义力量红军派的恐怖主义进行渗透并且提供武器，跟“68革命”一开始就向抗议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学生们提供莫洛托夫鸡尾酒炸弹如出一辙，就是煽动左翼恐怖，然后扩大宪法保卫局的职权即国家威权，强化红军派所反对的警察国家体制。结果，红军派似乎与宪法保卫局成为民主体制内部相互否定却又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以致于有些德国知识分子将红军派假设为宪法保卫局一手制造的产物。在技术层面，乌尔巴赫多次破坏了红军派的重要行动，显示宪法保卫局对红军派的控制颇有成效。例如乌尔巴赫在1969年2月27日尼克松访问柏林期间提供了

若干失效的炸弹引信，导致红军派的暗杀计划失败；同年11月9日在西柏林犹太会所的爆炸行动，也因乌尔巴赫提供的引信失灵而流产。乌尔巴赫后来从宪法保卫局获得100万美元，改变身份后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加州的圣芭芭拉。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另一名有争议的前“六月二日行动”、红军派成员贝克(Verena Becker)，在她狱中服刑近三十年面临假释之际，2009年9月2日，德国内政部长肖伯乐(Wolfgang Schäuble)首次承认稍早的一则媒体报道，也即贝克曾经接受宪法保卫局十万马克充当线人。不过，更令人惊讶的，《南德意志报》2010年5月17日报道，从1973到1976年期间，贝克还是东德斯塔西的线人。无独有偶，两德统一后，红军派律师马勒(Horst Mahler)似乎同样扮演了这一双面线人的角色，他曾向红军派提供了第一支武器——勃郎宁9毫米手枪，后来成为极右组织NPD的领袖至今。

当极左组织如红军派残存成员于1998年4月宣布解散，其他几个极端组织如“革命细胞”成员被捕殆尽、“红色佐罗”在90年代初期不再活动，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组织的控制似乎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如果不考虑冷战结束这一大背景的话，其渗透战术不能不说是成功的，只是，当政治形势变化，宪法保卫局的监控转向监视那些并非极端主义的政党甚至媒体，恰在某种程度上则实现了红军派最初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警察国家的代理人，宪法保卫局有着近乎无尽的欲望，将手插入政党政治和大众媒体，特别是东德统一社会党

的继承者、德国民主社会党前党魁、现左派党领袖吉西(Gregor Gysi)，和左派政治杂志《西塞罗》(Cisero)。吉西近年来屡被媒体爆料，指责他作为前东德社会统一党党员，曾经出入斯塔西，是斯塔西的线人。

如果对比另一个曾经的“疑似”极端主义组织——绿党的特殊待遇，那些配有吉西走出斯塔西大楼的照片、“线人登记卡”等原始材料的解密性报道虽然极有爆炸性，但也暴露出宪法保卫局在背后操作的痕迹。

相比之下，绿党却像是个政治宠儿。其许多初创成员都是跟红军派成员一道混战在1968革命的街头，直至1970年代初，包括后来的红绿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前绿党主席尤西卡·菲舍尔。菲舍尔与红军派乃至“豺狼”卡洛斯熟识，其在法兰克福的家还是他们的中转站之一，至今也未脱卷入街头命案的嫌疑。时至今日，绿党的许多外围组织仍然坚持激进主义的抗争方式。但是，这些都不妨碍绿党以及环保组织们在宪法保卫局内被另眼相看，与其他激进左翼组织如第四国际和斯巴达克斯等区别对待。甚至同样是街头的激烈行动，环保分子都被警察网开一面。

绿党的翻身始于与主流的合作。1985年，菲舍尔进入黑森州议会，1996年进入联邦内阁，从此，绿党已然跻身主流政党，能够在州和联邦政府的内务部层次接触宪法保卫局的文件，并影响宪法保卫局的政策与人事任命。绿党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趋保守。对宪法保卫局而言，尤其在环保已经成为德国和欧洲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之后，



绿党早已经算“自己人了”，而吉西这样的前东德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政党”眼中尚不具有足够的政治信任。

宪法保卫局对吉西以及其他左派政客和媒体的监视，实则充当了党同伐异的工具。民主的牙齿若长得太长，把民主社会变成了一个监视社会，那就是形容丑陋的獠牙了。

## 穆斯林兄弟会 不是尾声

德国的另一支共产党，库尔德工人党(KKP)，处境更惨，从1994年起被正式禁止，自然属于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但是，无可否认，这一监控充满了种族或者宗教歧视。类似的种族与宗教偏见，同样适用于宪法保卫局对待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土耳其人的米列哥鲁组织(Milli Goerue)，这两个穆斯林组织都是德国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视目标。

最初作为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和中介，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其在欧洲规模最大的机构就设在德国慕尼黑，主要成员来自德国在埃及纳赛尔政权期间接受的大量被阿拉伯世俗政权迫害的兄弟会学生，如萨伊德·拉马丹，他是兄弟会创始人哈桑·阿尔巴拿的秘书。此情形颇类基地组织受益于中情局对阿富汗战争抵抗运动的支持。

而米列哥鲁则是新兴的穆斯林组织，创立于1980年代初，公开宣示接受西方民主价值，不支持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和反犹主义，其德国总部位于科隆，在欧洲的30个分支机构有15个在德国境内，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希望融入德国社会、有着庞大的清真寺、学校和人员网络的组织。但是，直至本世纪最初几年，宪法保卫局的报告对此立场仍然非常怀疑，坚持米列哥鲁的极端主义性质。一般认为，2004年德国极右翼组织制造的针对穆斯林社区的科隆爆炸案，不能排除背后存在宪法保卫局的阴谋。

而问题在于，“9·11”之后的世界反恐浪潮似乎印证了宪法保卫局激进主义的保守立场。在冷战结束多年后，宪法保卫局似乎重新确认了民主的敌人。只是，当北非革命爆发之后，埃及兄弟会趁民主化选举第一次掌握世俗政权，欧洲该如何调适自身立场，介入到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和民主巩固进程呢？当库尔德工人党利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际在伊拉克北部卷土重来，叙利亚内战成为库尔德工人党又一次新的发展契机。目前，库尔德工人党领导的库尔德武装正在叙境内成为一支可与自由军及基地组织抗衡、并且屡屡发生冲突的独立武装力量。德国以及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观望，或许能够部分解释宪法保卫局的民主激进主义对这些穆斯林组织与民主关系的困惑。但是他们究竟是民主的敌人，还仅是宪法保卫局制造的敌人？

# 胡适反对计划经济

## ——从《独立评论》时代到《自由中国》时代



特约撰稿人 林建刚（天津，linjianganghaizi@163.com）

### 一

1930年代，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围绕着民主与独裁展开了一场论战。那时，独裁成为潮流，不论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纳粹德国的希特勒，还是苏联的斯大林，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统治都是或左或右的极权体制，而当时的中国，恰恰又面临着被日本侵略的危险，因此，以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为首的自由主义的信徒，开始热衷新式独裁。面对这种情形，胡适、张佛泉则表示坚决反对，力言中国应该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八十多年过去了，回首重新审视这场论战，我们不能不钦佩胡适等人的睿智与远见。

或许是由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太有名了，这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在经济制度上的分歧。

1930年代，由于苏联五年计划中所宣传的经济成就，也由于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导

致的经济大萧条与大倒退，这一正一反的例子使不少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迷恋计划经济。

与此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当时的中国又面临日本的侵略，在不少人看来，有必要将国家的一切经济资源全部收回国有，进而奠定对日作战的经济基础。

在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中，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太多了，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翁文灏、丁文江、吴景超等。在这些一致主张计划经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胡适的态度则显得有些暧昧，他之前似乎表示过赞同，后来又表示过警惕。

胡适曾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明确表示：

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

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止庵编《胡适论社会》，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第84页)

这段文字出自胡适1926年发表的一篇演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胡适此时倾向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这与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经济主张是一致的。

然而，到了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时代，胡适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有了变化。

1934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建设与无为》。在文中他写道：

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23页。)

这似乎是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表示反对。在他看来，政府大规模的介入经济建设不仅无利，而且有弊。

## 二

胡适反对政府介入市场的理念，来源于他的“无为”哲学。

1932年，当胡适第一次见蒋介石的时候，就曾送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胡适在此书中阐发“无为”哲学，希望蒋介石不要管得太细，希望国民政府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不要通过国家公权来侵害个体私权。

胡适建议国民政府政治上“无为”，并由此出发，进而反对计划经济。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独立评论》停刊。胡适临危受命，出任驻美大使。《独立评论》的作者则大多留在国内从政。



翁文灏、吴景超、张慰慈、钱昌照、王征等人组建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主席。由于对计划经济的迷恋，资源委员会组建了一系列大规模国有企业，并且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大规模鲸吞民营经济，形成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流。

对资源委员会的这些举措，胡适在抗战后期表达了自己的异见。1945年2月3日，在给资源委员会成员王征的信中，胡适写到：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画了。套一句老话：

“为政不在多计画，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

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天网”或太密耳。（《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 1979年5月第一版，第2页）

胡适之所以担心“天网”太密，是源于他对无为哲学的发挥。与此同时，胡适还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加以佐证。西汉时期，面对民生凋敝的困境，汉初的文帝与景帝采取休养生息之政策，尽量少干预农民的经济活动，这才有了汉朝帝国的百年兴盛。与此相印证的还有胡适家乡绩溪在面临天平天国

大乱之后经济恢复的情形，这两个历史事件都印证了“无为”哲学在恢复大乱之后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

胡适对“无为”哲学的发挥，使他的经济思想颇类似于哈耶克的经济主张。

在此之前的1944年，哈耶克发表了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看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远逊色于市场本身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用政府来控制经济最终会导致经济的衰退，而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时，当肚皮都被国家控制时，思想自由所赖以生存的经济自由就都不存在了，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面对胡适信件中对计划经济的质疑，王征则坚定不移地拥护计划经济。在回复胡适的信中，王征写到：

至于老兄的方案，“无为”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话，我想了好久，到现在还



不敢苟同。……此次战后，计划经济成为世界不可移易之方针，一则由于苏俄之战绩，一则美国战时计划之成功与罗氏战前New Deal(新政)之成绩，使我们反归“无为”与传统的农业自由经济，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也是世界经济势力不容许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一版，第8页)

王征是胡适的老朋友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任美国新银行团秘书，并同胡适一起组建努力会，编辑《努力周报》。1920年胡适发表《争自由的宣言》，王征是签名者之一。

虽然在政治理念上两人没有分歧，但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经济理念上的巨大不同。王征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而他之所以拥护计划经济，主要源于他对世界潮流的判断。在王征看来，不论是当时的苏俄，还是美国经济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这种计划经济的大趋势是很明显的，倘使中国不走计划经济的路，就会落伍于世界经济的潮流，世界上的经济势力也会反对我们。

最后，针对胡适的观点，王征在这封信的最后抬出了双方共同的朋友翁文灏作为自己的后盾：

近来重庆来人，以政府原则决定大谈其私人经营与政府计画之不善，不知此多系私人，又善经营，总有点个人利害问题。究竟战后国民总储蓄每年最大估计能有多少，是否能担任国家实业化重任，关于这一点，我们咏霓(翁文灏)老兄究系学者，比这一班半官半私的人高明多了。你所举洪杨后恢

复，这系闭关时经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一版，第9页)

### 三

胡适与王征的争论，谁也不能说服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场论争来看胡适对经济的思考，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颇有类似之处。或许正是有了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契合，所以在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中，胡适对哈耶克的中国学生蒋硕杰就显得颇为偏爱。

蒋硕杰抗战时期曾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哈耶克最得意的中国学生之一。为了帮助蒋硕杰从事经济学研究，哈耶克曾亲自为他申请奖学金。1948年，当国民政府的“金元券”政策失败以后，胡适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推荐了清华的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

推荐这三名学者，胡适是有他的考虑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三名学者在当时都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刘大中曾留学美国，对经济自由政策情有独钟；蒋硕杰是哈耶克的学生，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吴景超在抗战时期虽然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但抗战胜利之后，则又重申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在吴景超看来，抗战时期实施计划经济，只是特殊时期经济政策上的权宜之计而已。

蒋硕杰回忆此事时说：

胡先生此举是有用意的，原来那晚席间，胡先生就直接向蒋总统陈述经济问题对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荐吴景超、刘大中和我三人随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讨稳定金元券的方案。总统立表采纳，就转身问翁

先生意见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赞同。（胡颂平编《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056页）

但最终吴景超、刘大中、蒋硕杰三人并没有去成南京。虽然在蒋介石面前，翁文灏表示采纳蒋硕杰等人的经济政策，但态度并不积极。对于翁文灏当时的态度，蒋硕杰深信翁“并没有意思接受我们作顾问”。

翁文灏态度消极，根本原因其实是由于翁文灏与蒋硕杰等人在经济政策上的主张南辕北辙。翁文灏是坚定的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当吴景超在抗战时期也主张计划经济时，吴景超与翁文灏的经济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在抗战时期他们可以一起在资源委员会共事。然而，此时的吴景超已经开始反对计划经济，而刘大中、蒋硕杰也是计划经济的反对者。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与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说到底，是很难在一起共事的。吴景超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吴景超就以“翁文灏有少爷脾气很难在一起相处”为由拒绝了去南京的机会。

#### 四

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去留之间的抉择。那些主张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与反对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在人生抉择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主张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如吴景超、钱昌照、张慰慈，大都选择留在了大陆，而那些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周德伟、胡适、刘大中、蒋硕杰等则都选择了离开大陆。最堪回味的是翁文灏，他本已离开大陆，且名列中共战犯名单，却在1951年又回



到了大陆——当然，回到大陆之后，翁文灏首先需要做的，是向吴景超学习如何写好检讨。

信奉自由市场的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的台湾，以《自由中国》为舆论阵地，开始系统阐释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这方面的关键人物则是哈耶克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周德伟。

周德伟做了两件事，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为拥护市场经济极为关键。第一件事是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交给殷海光翻译，并在《自由中国》连载。第二件事则是给胡适写信，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计划经济的危害性。

在给胡适的信中，周德伟写到：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

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止庵编《胡适论社会》，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第251页）

针对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轻视私有财产的主张，周德伟写信给胡适，信中写到：

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

（周德伟著《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288页）

如果说以前胡适反对计划经济源于他对“无为哲学”的发挥，那么，周德伟给胡适的信则一定程度上使他从经济学角度上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危险。

1954年3月5日，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会上的演讲词中（后整理为《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引用了周德伟的这封信，并对自己二十七年前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的错误主张表示忏悔，他倡议大家应该想想，



是不是一切经济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们计划？还是靠我们老百姓人人自己勤俭起家？（止庵编《胡适论社会》，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第254页）

他还说：

我希望政府的领袖，甚至于主持我们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领袖，听了这些话，翻一翻《自由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文摘》等，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止庵编《胡适论社会》，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第254页）

演讲结尾，他再次重申：

我们还是应由几个人来替全国五万万  
人来计划呢？还是由五万万人靠两只手、一  
个头脑自己建设一个自由经济呢？这是  
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止庵编《胡适论社会》，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第255  
页）

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翻译《到奴役  
之路》和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从〈到奴  
役之路〉说起》为标志，台湾的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逐渐走出了对计划经济的迷思。

## 五

在《独立评论》时代，绝大多数的知  
识分子都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而到了《自  
由中国》时代，情况则发生了逆转，许多著  
名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周德伟、夏道平、  
戴杜衡、高叔康等，都成了市场经济的宣传  
者与捍卫者。而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信  
仰，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台湾的经济转  
型。

1958年，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选  
举，大力推荐蒋硕杰。蒋硕杰最终顺利被选  
为院士，时年40岁，是当时中央研究院最年  
轻的院士。两年后，蒋硕杰的好朋友刘大中  
也顺利当选院士。

与此同时，当时的台湾面临着经济如何  
转型的问题。与1948年翁文灏内阁不同，国  
民党政府全盘采纳了刘大中和蒋硕杰的经  
济主张，他们两人最终成为国民政府经济转



型的决策顾问。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陈诚。  
陈诚重用以尹仲容为首的“经建派”，尹仲  
容采取的经济政策大多就是刘大中、蒋硕  
杰设计的。台湾的税制改革是刘大中设计  
的，而当时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重点扶  
持民营经济。

与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不同，  
台湾此时的政策则是民进国退。政府规定，  
所有的美援必须全部用于资助民营经济，政  
府的国营企业不得利用一丝一毫。通过这种  
措施，民营经济大为发展，进而使台湾的经  
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进  
而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经济基础。

而胡适对计划经济的态度，从赞同、警  
惕进而反省，可见其智识上的诚实。而胡适  
对刘大中、蒋硕杰的大力推荐，则可证明其  
识人的眼光。Q



# 盖兹比的了不起

特约观察员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看到曾经英俊如王子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盖兹比,不出所料地倒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慢慢沉下去,我还是有些惊讶,甚至有些扼腕:就这么死了吗?就这么死了呀!是的,“那一帮混蛋”继续活得很好,而那一帮混蛋加在一起也不如的盖兹比就那么死了,而且是为了一个“声音里都充满金钱”的资产阶级女人死的。显然,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兹比》为“美国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事实也如此,这个追逐个人梦想而不得,反丢了卿卿性命的盖兹比,也的确确实喂养了不少以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道德虚伪为己任的学术论文。可是,什么是“美国梦”呢?

在“美国政府学 American Government”的第一堂课上,老师把这个问题写在了黑板上。教材书开篇便对“美国梦”定义到:所谓美国梦就是一个理想的幸福的成功的美国生活,这包括财富、房子、孩子的未来,以及当总统的可能。最后一句,同学们笑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笑话——林肯的父亲是鞋匠,里根的父亲是皮鞋推销员,克林顿的父亲是一位汽车推

销员，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父亲，还是一个老外，老师严肃地说。接着，他说道，所谓政府学便是如何让政府实现每一个人的美国梦。早在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和1630年温斯洛普的布道文《山巅之城》中，美国梦便已现雏形。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

“美国梦”得到了清晰的表述，而1787年颁布的美国宪法则用法律的形式对其做了规定，这便是人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若从哲学角度说，所谓“美国梦”便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其理论基础便是1690年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中提到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者统一而不可分割。因此，对于个人来说，早期的美国梦概括起来便是“财富与自由”。无疑，“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故事可以说是这个美国梦最好的阐释。他也正是盖兹比精神之父。在小时候那本《牛仔卡西迪》一书后，盖兹比制定了一个自我改进计划和个人决心，如每周读一本有益的书或杂志，不浪费时间等，这些可以说是直接从富兰克林自传中抄来的。尽管盖兹比的财路很可疑，然而按照富兰克林的方式，他只花5年便实现了富兰克林式的美国梦：他成了一个年轻的富豪，拥有一座宫殿式的别墅，宾客如云。不过，这只是盖兹比故事的开始。

因此，当我发现盖兹比的故事与开拓时代的老派的美国梦截然不同，也与现代的比尔·盖茨的故事完全没有关系时，我就一直很奇怪，盖兹比有啥了不起？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幽暗的角落看到一句静悄悄的



话：“世界上的风云大事，归根结底，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这才是伟大变革的所在，整个未来、世界的整个历史，最终都是对个人潜在能量的宏大总结。”据说，这句话是荣格说的，我没有找到出处，却由此看到盖兹比的了不起。

在评价菲兹杰拉德的创作时，与其同时代的诗人、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说：“他像是亲自参加一次舞会，自己翩翩起舞，同最漂亮的姑娘跳着探戈，又像是一个从中西部来的小男孩站在舞厅外面，鼻子贴着舞厅的玻璃窗向里张望，心里嘀咕着门票要多少钱一张”。其实，这不仅是菲兹杰拉德与盖兹比的写照，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心态的写照。1920至1929年，此时的美国已经完全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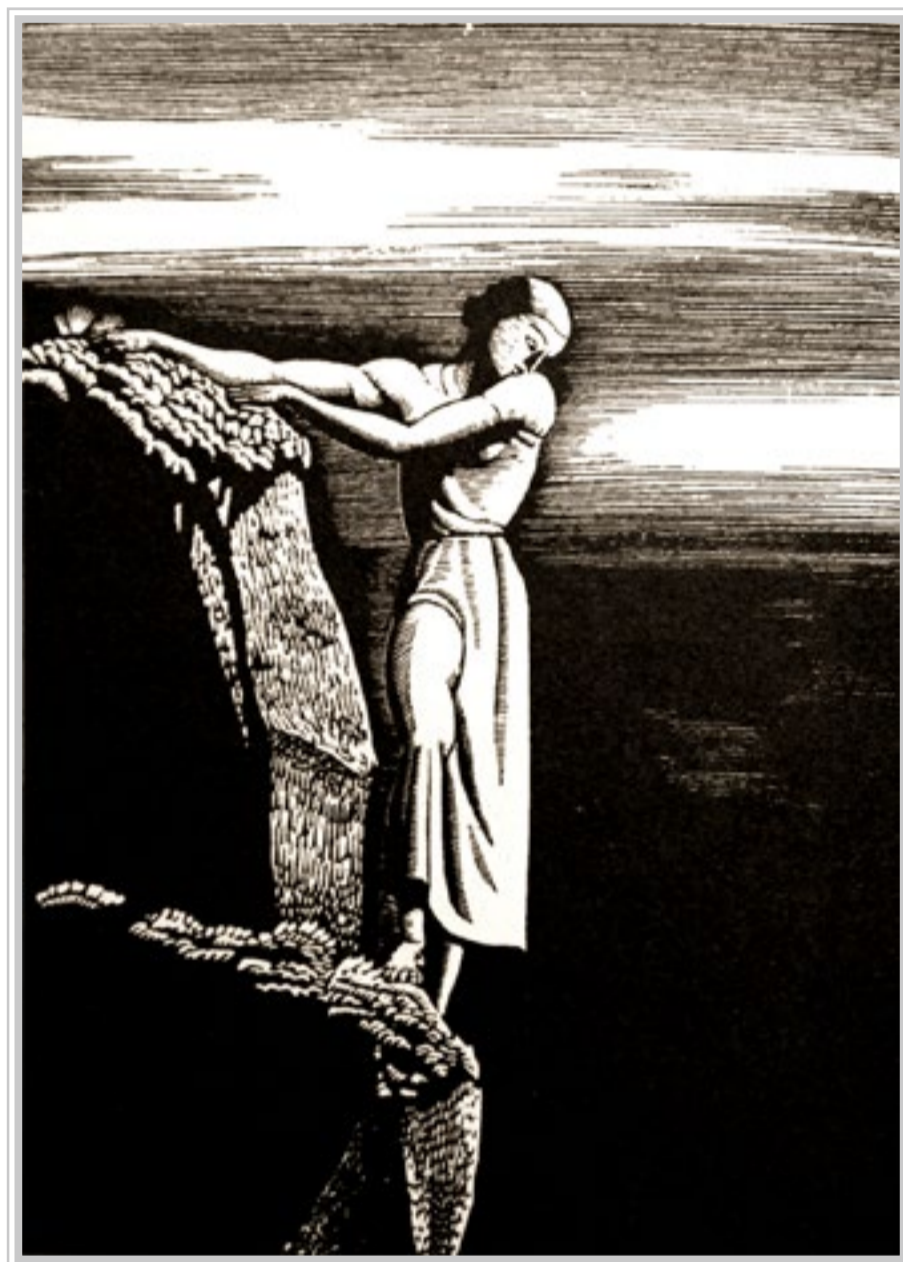
社会空前富裕，城市迅速发展，一切日新月异：新黑人(New Negro)、新妇女(New Women)、新娱乐(New Pleasure)，乃至出现了一个“新时代”(New Era)。不过，这么一个新时代“对大部分一类人而言，20年代与其说是繁荣的时代，不如说是为生存而拼搏的年代。账单付清后手上余钱不多，只能看着有钱人寻欢作乐”。1928年底，依然有六成美国家庭年收入少于满足基本生活要求的2000美金。住房虽然建了许多，但直到在1930年，52%的美国人没有自己的房子。虽然在“一战”中，美国大获其利，但在知识分子们看来，这是西方文明失败的标志。为此，现代派诗歌祖宗艾兹拉·庞德愤怒地将旧文明称为“一个老娼妇”。然而，新的现代文明又让他们感到陌生和不安，这便是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为此，斯坦因和海明威等作家离开美国，远居巴黎或是欧洲其他地方；南方十二位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齐力抨击现代文明。既迷恋于新文明新娱乐的生活方式，又深陷于传统价值而不能自拔的菲兹杰拉德只能透过他的笔，传达他的失落与空虚，这便是盖兹比：传统的美国梦已经无法满足他，他并不稀罕财富，他所追求和守望的是“纯洁的爱情”，或是说那盏绿灯，那“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來”，即一个

新时代的美国梦。

这个梦的结果却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的向后推，被推入过去。”这是小说最后一句话，如今刻在马里兰州菲兹杰拉德夫妇的墓碑上。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中，他们的个人梦想与生活都失败了，这与国家民族无关，与世界上的风云大事也都无关。《了不起的盖兹比》出版八年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开始。这位总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希望和梦想的实践者之一。”也正在此时，

“美国梦”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且流行起来。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历史著作《美国的史诗》出版，其书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电影最后，尼克拿着他新打印出的书稿“Gatsby”(盖兹比)，犹豫片刻，拿起笔加了两个漂亮的手写字“The Great”。这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在《麦田的守望者》中，塞林格说：“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清醒的梦想家盖兹比是一个不成熟的男人，但，了不起。📖



峭壁上的少女 肯特(美国)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文景

博客  
网易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多看阅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